



《记忆》105期

目 录

【专 稿】

余敏玲 同中有异的两岸党国体制

【毛泽东研究】

唐少杰 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

余汝信 “五七指示”：毛的理想社会模式及其破产

【评 论】

阎长贵 不为尊者讳，不为自己隐——读《良知的拷问》兼谈文革回忆录的写作

【述 往】

王 锐 我亲历的“吃人肉事件”

潘祛病 一生育桃李 终身求真知——纪念《记忆》的良师益友刘秀莹老师

【编读往来】

1. 周元龄的建议与纠错
2. 何蜀谈任彦芳文章之误
3. 吴盛杰谈文革历史研究
4. 庄晶瑞称赞顾土之文
5. 读者谈杨继绳的文章
6. 吴赛丽、黄小龙谈《记忆》
7. 赵晖对胡庄子之文的纠正补充

【年终小结】

【2013年总目录】

【版权声明】

【专稿】

同中有异的两岸党国体制¹

余敏玲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形成国共政权在两岸长期对峙的局面。由于国共相左的意识形态，在国际上又分属两个不同的阵营，从而开启了亚洲冷战史关键的一页；同时也使得冷战时期两岸历史发展迈向新的阶段。

早期关于美苏对立的冷战时期研究，西方学界主要是政治学者的天下，后来慢慢有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加入；历史学者由于能够直接掌握的史料不足，长期缺席。这个现象到1991年苏联解体，档案大量开放之后，迅速改观。西方历史学者投入冷战时期研究日多，台湾则明显落后。有感于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遂于2000年成立两岸研究群，希望藉此推动历史学者加入冷战时期两岸历史研究的行列。自2001年起，两岸研究群陆续举行四次关于两岸分治以来历史发展的会议。第一次会议的部分成果，以“1950年代的海峡两岸”专号的形式，刊登于第40期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其后的两次会议则以专书形式出版。陈永发主编的《两岸分途：冷战初期的政经发展》，是台湾第一本全由历史学者撰写的两岸研究论文集，梳理1949年到文革之前，国共两党政策如何影响台海两岸的政治与经济的发展，特别重视新史料与档案的运用。其内容包括两岸分立之后，国共如何巩固政权并向美苏学习、如何回应恢复与发展经济问题的挑战，以及知识分子如何重新调整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第二本是谢国兴主编的《改革与改造：冷战初期两岸的粮食、土地与工商业变革》，探讨中共如何利用“民主评议”的手段向民营企业课税，国民党技术官僚又如何透过建立金融机制引进外资与发展经济；两岸经济体制的相反走向：台湾国营铝业公司如何将技术转给民营工厂以求生存，大陆如何透过改造将私营企业等国有化。此外，该书也比较了国共两党在政权分立初期粮食供应政策的异同，并重新反思两岸的土地改

¹ 此文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余敏玲研究员主编的《两岸分治：学术建制、图像宣传与族群政治》一书的导论。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12年7月。

革。

本书收录的论文大多数来自于2008年6月召开的“冷战时期海峡两岸的社会与文化”会议。论文选择的标准，以能够提出新资料或新观点为原则。各篇论文虽各有其重点，不过还是可以放在党国体制的大框架下来讨论。

这里所谓的“党国体制”，乃指一国之中某一独大政党意欲或实际掌控国家所有的资源与机构，并试图将党的意志和权威尽可能地渗透到政府的每个机构，甚至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同时，政府所有机构均无法独立于党的领导和指令之外，国中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政党或其他社会力量强大到可以监督、挑战这个党，或与之抗衡。党政合一的结果是，党的利益优先于政府的利益。部署各篇论文清楚地彰显出，冷战以来两岸的社会文化发展，均是在党国体制的架构进行，无法脱离政治单独讨论，族群问题更是如此。即使后来有党国体制的松动或崩解，两岸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必须溯及源头，才能了解症结所在。

党国体制本来不全然是国共最初设想的治理蓝图。不幸的是，两党自从以俄为师之后，即殊途同归地朝向这条道路迈进。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本以宪政民主为最后依归，然而孙逸仙主张效法苏联共产党，期使国民党因此成为具有战斗力、能够完成统一大业的政党，即埋下了建立党国体制的种子。南京政府成立，国民党号称统一全国，实际上能够控制的省份并非真的及于全国，其后又有日本侵略与国共内战；加上党的松散意识形态与组织，在大陆时期始终未能实现所欲成就的党国体制。国民党撤退来台，由于坚持反共抗俄的政策，继续延用1948年在南京颁行的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冻结许多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而其统治的台湾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相对稳定，面积又小，加上有军队作为后盾，要贯彻党的意志，远比大陆时期容易，反而真正成就了党国体制。同时，在台湾海峡的另一边，中共面临的挑战更大。相对而言，中共的建党从一开始就与苏联关系密切，理念与组织也更为贴近苏联共产党及其党国体制。在中共执政之前，特别是延安整风之后，党意志力的贯彻远比国民党彻底，这也是其能取得内战胜利的要因之一。然而中共建政之后，所面对的再也不是偏促一隅的根据地，而是全国发展不一、土地广大、民族杂居的中国，如何实现以党领政，通行全国，确为一大挑战。

无论是蒋介石或毛泽东，在两岸分立政权之后，其首要任务均为坚实地建立

或扩大党国体制，巩固政权。党在制定政策之后，由谁执行、如何执行，如何宣传党的理念和政策，在在考验党国制度的建立与成效。本书将分别从学术建制、图像宣传、族群政治的角度，探讨他们在党国体制之下的运作情形。蒋介石和毛泽东时代同是施行党国体制的高峰期，但是在这三方面的发展与结果，可以看出两者仍有不少相异之处。国共党国体制的同中有异的对照，可以令人更为明晰地看出两党在本质上的区别及其所显现的意义。

一、学术建制

党的势力进入学术机构，并且成为党国体制的一部分，是1949年之后国共特别是共产党，汲汲经营之所在。党国体制在学术机构的体现，主要在意识形态的渗透与灌输，以及党组织的建立。在中共眼中，从国民党接收过来的学术机构都是受到欧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重灾区”，如何扫除他们的资产阶级思维和作风，如何建立与运用新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来树立党的权威与合法性，是中共念兹在兹的工作重心所在。过去研究已对中共重组学术机构勾勒出一外在骨架，却缺乏内在理路的剖析。王扬宗与杨东平的文章恰恰提供许多过去无人谈及的重要细节，彰显出党意志的执行与贯彻。西人有云：“魔鬼藏在细节里”。正是这些魔鬼般的细节，反映出中共学术建制的核心所在。

建党以来，中共即在校园内发展地下秘密组织，尽管中共亦有共青团作为党的外围组织，不过建国后党势力的进入校园，主要透过院系调整，设置党组或党委来完成，以达到改造受“资产阶级毒化教育过深”的大专院校的目的。目前中国大陆出版关于院系调整及大学改革的论文或专著之中，完全没有触及党的势力如何进入高等院校。¹杨东平论文的贡献之一，即在于以清华大学为例，清楚地说明了这个过程。在老师方面，中共透过具有党员身份的青年教师逐渐接管系所

¹到了1950年代后半，大学均设党委。大陆目前已出版的关于院系调整的著作并不少，可惜多半是陈列一堆表格，告诉读者那些院系与大学被拆解与合并；或是只提到中共为了因应工业化的需要，模仿苏联模式，展开专才教育，拆分数个历史悠久的综合性大学。例如，胡建华：《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没有提及党的组织如何在学校运作的情形；王立诚、管蕾：“建国初期上海高校的院系调整研究”，载《1950年代的中国》，吴景平、徐思彦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页233—259。

大权；对于非党员的资深教授或进行思想改造，或外调他校他市。民国时期著名大专院校的教授大多被调出，总数减少；大学教授也从过去可以自由选校的身份，变成固定在某一院校的附属品。在学生方面，党的组织进驻学校之后，开始对学生施行政治审查。凡是过去有历史问题或阶级背景不符合当时政治标准者，皆不准入学。¹其次，中共利用各种教学管道与教材，积极灌输马列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观念，进行党化教育。再者，配合共青团的活动，在学生中物色与培养新的干部。1953年，清华校长蒋南翔率先提出从思想及学习好的学生之中选拔担任政治辅导员，更是中共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干部的重要制度。当今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清华就读时，就曾担任过政治辅导员。

诚如杨东平的结论指出，中共对院系调整重视拆分更多于合并；目标是将1949年以前著名综合大学，也是“崇美、亲美、媚美”的重点大学肢解，特别是拆散其人文学科。中共原本计划慢慢地进行，因为韩战的爆发，认为机不可失，马上拉高层次，打出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封建买办教育的口号，声称教育应该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这使得受美国资助的学校如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等，立即成为被整顿与拆分的目标。拆分的结果是，许多综合大学变成专业专才的大学，原有的教会大学全部消失。同时中共眼中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均被取消。显而易见地，院系调整不是单纯的大学结构的改变，而是透过各系科目更为专业的分化，调整人事之余，改造旧的教育制度和教授的思想。

院系调整终止了中国半世纪之久，源自欧美的综合大学制度，走向重视新意识形态与更为实用的专才教育；学门窄化，弃通才，偏专才；重理工，轻人文。事实上，这种偏专才与重理工的现象，早在1930年代国民党即曾提出过，只是没有实行而已。当时有人鉴于太多文法学院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建议不如发展理工等科目。再者，九·一八事变的影响和学潮的关系，促使国民政府更重视实科教育。陈果夫甚至提出应停招专上文法科十年，将其经费拨给农工医科使用；后以太过狭隘而没有骤行。²耐人寻味的是，观诸今日大陆又流行大学整并之风，

¹ 关于政治审查，散见于许多回忆录，至今未有研究专论，值得开发。

² 1931年10月教育部草拟改个全国教育方案，认为当前中国教育弊端来自“个人主义及抄袭美国”。建议“应注重实科，对于文科应酌量缩减，即养成农工医等项专门人才，对于文法等科，应逐渐裁并。”陈能治，页33—34、50、91。

以超大型的综合大学为目的，这是否意味着钟摆又向另一极端的摆荡？

反观国民党势力的进入大专院校，主要以安定校园、防止学生受到共产党“蛊惑”为前提；此乃由于国民党认为学潮不断是失去大陆的要因之一。1950年12月，党中央即在当时台湾现有的六所大专院校成立知识青年党部（不是青年团），多由校长或训导长担任党部主任委员，同时以此监控教职员员工与学生的活动。教师若有反政府、反党言论者，小则受到约谈和恐吓，大则可能会有升迁困难或遭解聘的后果。¹不过，国民党与中共不同之处在于没有思想改造，对学生也没有政治审查。其所施行的党化教育，也只是在1950年恢复三民主义为大学共同必修课，²并且没有要求用三民主义来诠释所有的学科（包括自然学科）。同时，国民党也没有将台湾大学原有科系进一步细分成更为狭窄的专才化大学。

1950年代的国民党势力进入大专院校实际上共有三个管道：知青党部、军训制度与救国团。军训制度名义上是为了教授学生军事训练的术科，其实还有教官与训导处配合的管理及监督学生纪律与思想的功能。³学生军训与救国团的结合始于1953年。救国团的前身是中国青年反共抗俄联合会（1950年4月成立），后被并入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简称救国团，隶属于国防部总政治部，为国民党的外围组织。救国团成立于1952年10月31日，由当时身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兼主任。其目的在于加强青年团结，并以三民主义教育领导全国青年，完成反共抗俄复国建国使命。⁴救国团活动招募的对象，以高中生与大学生为主。

蒋介石期望救国团能兼具教育性、群众性、战斗性的功能。所谓教育性，乃

¹根据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29次会议，订定知识青年党部的原则：凡专科以上一律设置知识青年党部，由中央直接领导。龚宜君：《“外来政权”与本土社会——改造后国民党政权社会基础的形成（1950—1969）》，台北：稻乡出版社，1998，页111—120。

²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初期，即有进行党化教育的意图。但是什么是党化教育，定义始终模糊不清；是要灌输党的主张，或由党的机构或人才去办教育，或以党的意识形态统一思想，莫衷一是。1929年8月，国民政府明订党义为大学共同必修科目；私立大学增设党义课程者益日多。不过，多所学校执行不力，教育部也通融。某些国立学校，如武汉大学，即使得到国民政府大量资助，亦没有完全执行。1944年将三民主义订为大学共同必修科。陈能治：《战前十年中国的大学教育（1927—1937）》，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页59—63。

³1951年秋天最初试行于师范院校，1954年进一步逐次推广到各大专院校设立教官制度。李泰翰：《一九五〇年代台湾学生军训之研究》，台北：国史馆，2011，页37、83—84、118—119、170、194—196。

⁴1953年9月成为国民党第九知青党部。入团条件为凡信仰三民主义，坚持反共抗俄立场，年龄在15—30岁的男女均可参加。团员须信守八项信条：（1）信仰三民主义，（2）拥护领袖，（3）服从命令，（4）严守纪律，（5）自立自强，（6）实践力行，（7）互助合作，（8）服务牺牲。幼狮出版社编：“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答客问”，《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台北：幼狮出版社，1952，页30—35、39。

是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推动正确的革命教育。群众性,指从学校青年扩展到整个社会参加反共抗俄,战斗性则为提高战斗情绪、学习战斗技能、力行劳动生活、加强服务热忱,以应战时需要。¹在精神方面,需要培养青年崇尚主义、领袖、国家、荣誉、责任;军训教官由国防部甄选与核定。正如《自由中国》社论指出,救国团的章程号称“申请加入”,却又规定高中以上学生一律参加;名义上的加入,不代表就控制了青年的心。其次,救国团的成立没有法源依据,只有总统的指示;且浪费公帑至巨。²救国团的答辩,其成立依据是为了负责学校军训;成立目的则是为了避免大陆学潮再现,需以积极方式“团结青年、教育青年,使每一位青年人都能认清是非,明辨敌我,以及了解他自身对国家民族所负的重大责任。”³1960年3月,军训移归教育部管辖,与救国团分离;并将原有军事化形态,改为辅导性的委员会制,以青年社团为主要工作对象,建立青年育乐中心;废除学生个人团员制,改为学校团体团员制。⁴救国团在性质上有点近似于共青团,但即使在成立初期也没有特别重视思想教育的灌输,后来的活动“逸乐取向”越来越浓厚,与政治的关系越来越淡薄。对国民党而言,只要能将学生精力引导于社团康乐活动,不闹学潮,就算完成任务。⁵此外,国民党虽然希望能够做到以党领校的目的,实际操作视学校校长而定。台湾大学受自由主义影响,即使校长是国民党员,依然遵循自由学风;纵受干扰,也很难完全实现国民党所期望的以党治校。

同样地,国民党迁台后对中央研究院的控制比大专院校还低。朱家骅代理院长十八年间(1940—1957),虽身为国民党组织部部长,因明了过去在蔡元培领导之下,学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传统,在大陆时期从来没有企图在院内设置党部组织,并尊重各所研究方向与人事。⁶至于中央研究院党部何时设立,因资料散佚,一直找不到确切年份,目前仅知中央研究院为第35党部。中研院来台后有

¹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总团部编:“本团成立训词—中华民国四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团重要文献》第一辑,台北:1966,页5—6。

²《社论(一)》(“今日的问题”之十二)青年反共救国团问题,《自由中国》18卷1期,1958.1.1,页5—7。

³《社论(一)再论青年反共救国团撤销问题》,《自由中国》18卷11期,1958.6.1,页3。

⁴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总团部编:《团务十年》,台北:1962,页7、11。

⁵7.3/24国民党党史馆:“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80次会议纪录”,1956年6月13日。

⁶中央研究院八十年院史编纂委员会主编:《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台北:中央研究院,2008,页41。

一不成文规定：院里高层必须有一人为国民党员，来贯彻党中央的命令。胡适（1957—1962）、钱思亮（1970—1983）、吴大猷（1983—1993）均非国民党党员，故任命具有党员身分者担任总干事。¹朱家骅、王世杰（1962—1970）虽为党员，也是尊重中研究的学术自由传统。无论是院长或院士选举，国民党高层能够干涉的程度十分有限，院士投票有相当高的自主性。即使偶有与党政高层关系良好而当选院士者亦是极少数。²早在1949年之前，中研院确立的遴选院长的传统是先由评议会投票选出三位院长候选人之后，再由总统圈选。即使国民党高层有属意的人选，如果不在三名的名单之内，也必须尊重程序。

然而，这不表示中研院能够完全抵抗国民党的意志。三民主义研究所的成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67年，有党国元老提议在中研院设立三民主义研究所。1970年代初，为因应台湾退出联合国、校园爆发钓鱼台风潮、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及为了引导青年思想等，国民党指示中研院成立三民主义研究所。院方多以必须慎重，或预算已编，尚需时日等理由，行使拖延战术。钱思亮院长力阻在院内成立三民主义研究所多年。然党中央有人以三民主义模范省的台湾，不能没有三民主义研究所为由，终于在1975年成立筹备处，六年之后正式成所。钱思亮院长虽然被迫成立三民主义研究所，但他延聘专业杰出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陈昭南担任所长。陈昭南虽是国民党员，晋用人才的标准却是学位与专长，而非党内资历，院长也支持他的作法，因此三民所内纯粹的国民党意识形态专家人数屈指可数，反而有不少学有专精的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学者。³可见，国民党仍然无法完全左右中央研究院的院务。其次，国民党在院内仍是一松散组织，党小组规定每月开会一次，常常因为没什么事而不开会。党员的存在主要是缴交党费。党小组的组长多半委派工作不忙者担任，不像共产党以政治积极表现为标准。党员多半研读党交代的文件或讨论事务；开全院党院大会也以改善院务为主，与政治关系甚微。⁴他们没有像共产党员那样过严格的党的组织生活。

相较之下，中共当局对待中国科学院的态度，与对待清华、辅仁等亲美大学

¹中研院早期并无副院长一职，院长之下负责院务的是总干事。访问陶英惠先生，2011年8月17日，地点：台北中研院近史所。

²《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页180—181。

³《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页159—162；访问陶英惠先生，2011年8月17日，地点：台北中研院近史所。

⁴访问陶英惠先生，2011年8月17日，地点：台北中研院近史所。

并无二致；亟欲积极消除其资产阶级遗毒，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研究机构。王扬宗处理的，是1949年以后中国科学院的内部重组。中国科学院乃是留在大陆的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的合成体，中共将院士称号改为学部委员。这个看似简单的称号改变，实则牵涉到全国最高研究机构的体制改变。1955年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制度确立。当时官方人士号称此乃过渡阶段，最终还是要实行院士制度，实则不然。中共不愿党权旁落，结果在毛泽东时代一直没有实行院士制度。即使到1994年又恢复院士的称号，但是院士仍然不能选举院长。王扬宗利用许多外人难得一见的中国科学院档案资料，巨细靡遗地写出学部委员提名经过。无论是删减或增加名额，都有浓厚的政治考量；学部委员的提名实际上是红与专的拔河。我们可以从中共在筹组中国科学院的阶段，即由中宣部和统战部主其事，在院内成立党组，并且强力主导正副院长的任命，看出共产党亟欲管控科学院的强烈企图。

王扬宗比较中国科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写出变与不变的地方，十分精采。他虽然对政治干预学术的分析很多，也合理地指出有些弊病并非全然因为政治之故。例如，因为门生故旧多或近水楼台，得票也较多。这点在台湾也有近似之处，例如，李济担任史语所所长时，有段期间，人文组院士提名不是来自国外，便是来自史语所。霸气十足的李济，连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宣传部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与外交部长的王世杰院长，对他也是忍让三分，不敢提名国内法学界的同行。¹很难想像类似的情形会发生在共产党掌控的中国科学院。

二、图像宣传

党国体制的建立，不但需要党势力进入或渗透到各机关、团体、社会，同等重要的还有宣扬党的理念与政策。政治宣传的成效，更需依赖组织机构的配合、方法和工具的讲究，以及宣传内容的浅显易懂。图像作为宣扬政策和领袖人物的媒介，比起文字在文盲占多数的中国，更能发挥功能。

受苏联影响，中共从建党开始就重视宣传，设有专职机构。从建党到建国，

¹ 《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页133。

中共前后共有 16 位宣传部长（国民党有 32 位），其中有一半是留学苏联的。¹各地的党支部也设有组织和宣传部门，并且强调组织与宣传相辅相成的关系。对共产党而言，宣传不只是单纯的散播观念、政治教育或争取政治同盟，还必须与组织、意识形态及党的一元化配合。党的领导一元化与马列主义的贯穿其中更是重要。然而，这亦非可以一蹴而成。其关键就在于，中共利用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推行整风及思想改造，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强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锻炼党性，以此强化组织与党的领导。唯有透过这样的机制，才能达到党员惟党是从的要求。党一元化的真正确立，是在延安整风之后。²1949 年后，中共为因应全国的需要宣传编制迅速扩大。宣传部长陆定一更提醒宣传工作者，宣传部不是管党校、出版、报纸等具体业务（这些是思想工作的工具）；宣传部是帮助党委掌管整个思想战线。³在既有的基础上，特别是延安整风形成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共的宣传体制愈臻完善。

同时学习苏俄的国共两党，共产党学到精髓，国民党学到皮毛。民国初年，改组后的国民党新添了组织部，且强化了宣传部。但是与共产党相比，其间差异颇大。第一，最初掌管和活跃于组织与宣传部门的多为跨党分子，资深且有分量的国民党员对这些部门的工作，缺乏兴趣。国民党从 1927 年分共到 1949 年，宣传与组织部门负责人虽都由资深党员担任，然其更迭之频繁，令人咋舌。宣传部长几乎每年一换。第二，宣传部门和组织部几乎各行其是，中央与地方亦是不同的步调。第三，国民党奉为圭臬的三民主义，内容松散庞杂，可以诠释的空间很大。中共的马列主义相对严谨，加上组织、宣传、动员与意识形态由上而下的贯串，效率高，基本上能确保党路线的执行。内战时期，近似心战的宣传竞赛，国

¹至于成立之初，为何不直接仿效苏联，称为宣传鼓动部的原因待考。据悉 1928 年 7 月曾改为宣传鼓动部，但目前没有看到任何由该部办法的任何指示。参见 Marianne Bastid-Bruguiere, “Patterns of Propaganda Organization in the National-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in the 1920s,”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1920s: Between Triumph and Disaster*, Mechthild Leutner et al. e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2), p. 8. 林之达主编：“附录三：中共中央宣传机构及负责人简表”，《中国共产党宣传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页 306—307；刘维开编：《中国国民党职名录》，台北：国民党党史会，民 83，页 33—202。

² 参见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³ 陆定一：“应当纠正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给张际春同志的信”，1956 年 3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页 1096。

国民党一败涂地，不是没有原因的。¹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内战的惨败，宣传不力是关键之一。来台后，痛定思痛，于1950年成立了中央改造委员会，将政治宣传视为反共复国的精神骨干之一。其所制订的宣传目标为：对内，争取民众对党反共抗俄政策的了解与支持；对外，争取国际人士的同情与合作。宣传机构因而扩编，第四组（简称中四组；1972年改名中央文化工作会，简称文工会）专司对台湾岛内的宣传工作，海外宣传由第三组（后称海工会）负责，敌后（大陆）宣传由第六组（后称陆工会）负责。1950年代初期，蒋介石亲自主持经常性的宣传决策会议，参加者除外交、宣传的党政机构负责人及其实务工作者外，还有蒋的亲信。如此形成了宣传决策核心，蒋介石甚至亲订反共标语32条。²尽管如此，宣传部门确立及其决策核心的形成，并不意味着组织部门能够与之密切配合。从当时蒋介石一再强调宣传与组织不能各行其是，可见问题依旧。³

其次，国民党亦试图改善宣传方式。1949以前国民党宣传对象以知识分子为主，重视的宣传媒介是文字型的报刊杂志。然而撰文者却很少顾及读者的反应，视文宣如作文比赛，鲜少琢磨宣传技巧。这些弊病在国共内战时期，展露无遗，国民党也因此付出昂贵代价。1949以后，国民党开始重视下层民众，提倡宣传下乡，因而有巡回车到山地或各乡镇作文化宣传。在媒介上也变得较为多元化；除了传统的报纸、书刊之外，还有反共歌曲、戏剧（布袋戏、歌仔戏、话剧）、民间杂艺、电影、新闻影片等。事实上，这些形式国民党在大陆时期也曾讨论过，只是鲜少付诸实行；或者曾经利用过，频率亦低。同时，启用俄国十月革命后已有的交通工具宣传方式，在岛内增设了铁路公路宣传列车、出海宣传轮，要求在各地及各项商品（车票、火柴、菸盒、酒瓶等）张贴或加印反共标语。其中以收音广播最受重视，期望在各乡镇能达到“一里一收音机”的目标。⁴

¹ 参见余敏玲：《“伟大领袖”vs.“人民公敌”：从蒋介石形象塑造看国共宣传战，1945—1949》，2011年6月会议论文。

² 任育德：“中国国民党宣传决策核心与媒体的互动（1951—1961）”，《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2期，2009年11月，页222—234；中央改造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党务报告》（下篇），台北：1952年10月，页103。

³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编：《总裁重要号召及有关宣传问题训示集要》，台北，1963年，页138、149—154。

⁴ 中央改造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党务报告》（下篇），台北：1952年10月）页103；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中国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纪录”，台北，1955年10月，页87。

可叹的是，来台后国民党的宣传与内战时期相比，改善有限。这可从1955年国民党检讨宣传问题，看出端倪。中央委员会举列出来的宣传面临的问题有：

(1) 如何写出让农工群众易懂的文字与喜爱的；以目前党营报刊而言，为基层民众接受者不多。(2) 如何加强宣传与反映民众心理的配合。(3) 如何加强宣传与组织训练的配合。(4) 如何加强艺术宣传；艺术是可以达成宣传下乡的利器，其中尤以戏剧最重要。但目前连台北仍无一个良好的剧场。剧本来源的恐慌、戏剧人员的培育、地方戏剧的改良均须注意。¹基本上，有关当局知道问题所在，但是宣传的思维及运作模式和内战时期的相距不远，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更多的是纸上谈兵。特别是在当时物质环境下，寄望台北须有一个良好剧场，才能作好宣传的想法，更是一种精英与城市为重的思维。

不过，还是不能因此完全否定国民党的力图改善宣传方式。无可否认，来台后的国民党宣传媒介远比大陆时期多样化，尤其是非文字型的宣传，漫画就是其中一例。张世瑛的论文是台湾首篇研究国民党非文字宣传的力作。他透过党营报纸出版的政治漫画宣扬反共抗俄的国策，带领读者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党营漫画副刊在1953年多停刊，然到1950年代后期仍有反共漫画的出版；它们虽然不是刊登在国民党的机关刊物，仍是党授意之下的产物，如山巴（邱锡勋）的《反共小英雄》、刘兴钦的《反共双枪侠》及陈海虹的《小侠龙卷风》。根据陈海虹的说法，他是以小侠对抗魔教的故事，比喻台湾（小侠）为复兴基地，对抗中共“匪帮”（魔教）。²只是这样的隐喻，对于以看故事和图片为主要兴趣的儿童，恐怕很难理解其中的微言大义。台湾的政治漫画到了1960年代开始走下坡，这可能与当时政府颁定连环图画辅导办法（即审查制）有关。这也反映出国民党其实对以漫画为主的图像宣传，热度不长；为何如此，引人深思。

论及图像宣传媒介，海报（中共称之为宣传画或招贴画）其实要比漫画流传更广，更不受限制。海报可以张贴在大街小巷，各地醒目的位置。好的海报即使没有文字解说，简单几笔，也能达到老幼能解的目的。海报在政治宣传上大量使

¹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中国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纪录”，台北，1955年10月，页86—87；“中国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纪录”，台北，1956年5月，页104。

²山巴（邱锡勋）：《反共小英雄》，《漫画大王》，1958年12月开始连载；刘兴钦：《反共双枪侠》，《台湾漫画周刊》1960；陈海虹：《小侠龙卷风》，《漫画大王》，1958。详洪德麟：《台湾漫画40年初探》，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页71—88。

用且最成功的例子，莫过于俄国内战。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网罗了一批杰出的艺术家，以简单幽默或震撼人心的笔触，丑化敌人，也宣扬共产党的理念。¹国民党北伐期间，曾经印制过一些政治海报。²然而，最令人纳闷的是，国民党从清共之后，1930年代，甚至来台以后，电影海报或其他商业海报经常可见，唯独政治海报零零星星。为什么？个中原因值得探讨。

相异于国民党，中共从建党开始就重视对下层阶级的宣传；也因为中共的根据地在农村，必须更重视非文字的图像与口语传播，方能达到目的。中共承继俄共擅于运用政治海报的特点，加上鲁迅推展木刻运动的促进力量，使得海报与漫画在宣传革命上有相辅相成之功。抗战期间，中共将西方木刻与中国年画艺术结合，发扬光大，积极且成功地运用在政治宣传上。³中共执政后，掌握了国家机器与物资，大量运用图像宣传，如电影、下乡巡回的幻灯片队等等。但政治海报并没有因此被打入冷宫，反而大力提倡。例如1951年春，北京举行苏联宣传画和讽刺画展览会。1959年底举办十年宣传画展，共展出175幅政治宣传画。以图像而言，国共呈鲜明对比。国民党在1950年代初期之后的图像宣传，越来越不重视，中共则是越来越多；⁴可能因为大陆1950年代的海报留存下来的较少，当前最引人注意的是文革时期的海报研究。⁵

国民党在台湾的宣传主轴是反共抗俄政策，民族救星蒋介石的形象虽也是宣传内容的一部分，却没有像中共那样对毛泽东形象那么大规模，甚至走向极端地个人崇拜的宣传。毛泽东的光辉形象，除了诉诸报刊、文学等文字形式之外，早在抗战期间，已有许多非文字如音乐、美术等作品颂扬他的伟大；并用“红灯笼”、

¹ Stephen White, *The Bolshevik Poste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² 参见黄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美术活动史话》，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页38—45。

³ 参见洪长泰：《新文化史与中国政治》，台北：一方出版社，2003，页111—117、145—150。鲁迅引言见页114、117。

⁴ 洪长泰的新书，即有两章处理中共建国后利用图像的宣传。见 Chang-Tai Hung, *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55-209.

⁵ 如张忠龙编：《毛泽东历史视象 经典海报画册》，香港：次文化堂，1994；Stefan Landsberger, *Chinese Propaganda Posters: From Revolution to Modernization*, (Amsterdam: The Pepin Press, 1995)；Harriet Evans & Stephanie Donald ed., *Picturing Powe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oste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9)。

“太阳”、“北斗星”、“火炬”等与“光”有关的形象来比喻毛。¹建国之后，宣传毛图像的比率遽增。文革期间毛泽东就是党的化身，而他的受人瞩目，并没有因为文革的结束而消失。无论在毛泽东的生前或死后，无论在政治或非政治方面，至今依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以他为主题的视觉作品所展现的多重形象及其隐含的意义，值得进一步的探讨。梅嘉乐（Barbara Mittler），运用海报、绘画、徽章、T恤衬衫、茶杯、瓷器、雕刻，甚至护身符等多种媒介，说明毛泽东的形象在文革前后，甚至今日，都广受注意。

梅嘉乐质问，如果毛泽东只有张戎的传记《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所描述的魔鬼那一面，那么为何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多年，毛在今日中国依然流行？她的研究指出，毛的形象事实上是多重，而非单一的。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中国人认为毛象征好的、平等主义的和利他的过去。梅嘉乐并以文革时期所展现的毛泽东形象作为标准，讨论出现在文革之前和之后有关毛的艺术作品的异同。无论今昔有关毛泽东的作品是对其表示推崇、嘲弄、批判或嬉戏的态度，都必须有官方宣传的标准毛形象作为背景，否则即使想颠覆他的形象也无法达到目的。纵然文革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经死亡，毛的形象仍旧无所不在，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今日中国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三、族群政治

国共对族群问题的思索，向来是政治考量高于一切。基于国防、战略与统一的考量，中共建政以来对于居住在广袤领土上的少数民族，一直不敢轻忽，并且积极运用党国意识形态与制度争取民心及认同，期望将全国56个少数民族全部纳入党国体系之中。而国民党早期对于族群问题的漠视和压制，反而造成日后党国体制崩解的要素之一。

这个部分的标题以“族群”包含“民族”，主要考量是使用“族群”一词讨论台湾的省籍问题比较方便。“民族”与“族群”有许多共通的地方，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民族通常牵涉到“政治主权”的观念。²“民族”与“族群”

¹ 洪长泰：《新文化史与中国政治》，台北：一方出版社，2003，页206—209。

² 王甫昌：《当代台湾社会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4，页5。

可以成为互相置换的名词，是晚近十多年来的事。按照美国社会学家 Richard A. Schermerhorn 对“ethnic group”“族群”的定义：大社会中的集体（次团体），其成员拥有真实或假设（想像）的共同祖先，有共同历史记忆，有自我定义的特别文化表征（其中包括亲属模式、宗教信仰、语言或方言、部族、国籍、地域主义等）。通常数量占优势的民族，如美国的白种人、中国的汉人，不会将自己当成一个族群；只有当一弱势族群界定这个多数族群，后者才会产生“我族”的族群意识。此外，从 1970 年代以后美国人类学者，已经不认为“种族”是个可以使用的分析或价值中立的概念，反而是带有歧视、社会不平等的观念。“民族”、“种族”、“族群”虽然可以有不同的范畴，但也可能形成彼此穿透或竞逐的“拉杂共构”情形。所谓“拉杂共构”，就是“相互假借、比喻、穿凿附会，共同建构一个整体的故事”。省籍问题会演变成“族群关系”，是经过许多的拉杂共构而成，在台湾特别是和“国家认同”挂钩。¹

对国共而言，两党所面临的学术建制及图像宣传，性质相似；歧异的是范围或规模大小。但是族群问题则不同，两党所面临的不仅是数量与种类之别，更大的性质差异来自于两党对“民族”的分类或定义，以及所辖领土的大小，因此很难处处作同等比较。国民党在台湾所面临的原住民，是唯一拥有同族群所居住土地的非汉民族。满、蒙、藏、回族虽也不是汉人，但他们在台湾都没有同族群居在自成一区的土地上。同时，原住民所居之地不涉及国家主权或国防、战略等问题，处理起来相对容易。相比之下，中共面对的是占有全中国土地六分之一的新疆，占有八分之一土地的西藏，生活在西南或东北的众多少数民族，加上有国家主权及国防的考量，其所面临的挑战，远比局促一隅的国民党要巨大和复杂得多。

国民党初建之际，民族问题一直其关切的焦点之一。辛亥革命后的孙逸仙的民族观由排满，变成“汉、满、蒙、回、藏”的五族共和。孙所言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实际上是以汉族取代满族的民族观念。孙认为民族乃是由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构成。1943 年，蒋介石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主张“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这多数的宗族，本是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的分支。……他们各依其地理环境的差异，而有不同的文化。由于文化的不同，而启

¹张茂桂：“族群关系”，《社会学与台湾社会》，王振寰、瞿海源编，台北：巨流出版公司，2003 年，二版，页 216—229；王甫昌：《当代台湾社会的族群想象》，页 13—14。

族姓的分别。”¹由于同源或婚姻关系，而成宗族，形成一个大家庭；而五族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被视为部落。蒋的民族构成观比孙更重视“血统”关系。

其次，国民党在民族政策方面，主张以三民主义来治理，寻求全国统一。1929年，国民党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蒙回藏族的政治决议，只要求住在这些地区的人民必须实行三民主义。1931年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注重边地的开发及其人民的生计。1935年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到：“重边政，弘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1945年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对边疆政策指出：“政府处理蒙藏事务，一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一个宗族一律平等为基点，进求融合其文化习俗，消弭狭隘之部落界限。一面培养各宗族之自治能力。”国民党虽一再重申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然其民族融合的实质是民族同化—以汉人的文化来同化不同民族的文化。²二次大战及来台后，国民党的民族观与民族政策仍是延续这样的思维。简言之，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没有“少数民族”的概念；只有边疆政策，没有民族政策。国民党边疆政策的施政核心在于实行三民主义，至于如何施行与落实、具体方法为何，鲜有讨论。

国民党最初对原住民的界定仍是沿用部落与宗族分支的概念。詹素娟的文章详细地论述台湾原住民的称呼与自我称呼的历史变迁过程，时间跨度从二战后一直写到二十世纪末。1945年，国民政府接收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对岛上原住民以“高山族”，取代日本人的“蕃族”称呼；1947年，又改称为“山地同胞”，简称山胞。一直到蒋介石过世后，随着台湾党国体制的逐渐松动。1983年开始有原住民大学生发起的“台湾高山族民族自觉运动”，争取少数民族的身份与基本权益，伴之而来的是原住民“正名”运动。经过十年的奋斗，终于在1994年促使“山胞”一词走入历史。1997年的修宪，原住民取得了“民族”得较高位阶。国民党对原住民身分认定与称呼的改变，反映出其民族观从“宗族”与“部落”到“民族”的演进，此乃因党国体制的松动，社会的多元化逐渐形成，国民党的“民族”等于“宗族”的定义与政策受到质疑和挑战所致。

如果说国民党在蒋介石时代向来不认为原住民是少数民族，那么对于发生在

¹ 蒋中正：《中国之命运》，台北：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76，页2。

² 李国栋：《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页152—162；赵学先等编著：《中国国民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页121—126。

汉人之间的外省人与本省人，基于历史文化、生活习惯差异及制度不平等造成的族群问题，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冲突产生之时，则尽量压制，不愿正视问题的存在并试图解决。结果留下严重的后遗症，造成日后越来越难解的族群怨怼与冲突。

许雪姬的论文，正是处理台湾的省籍族群问题的历史根源及其发展。她将其历史源头溯自清代、日治时期；并认为“二二八”事件的发生，证明了台湾族群问题已经十分严重。1950年代初期，国民党中的有心人希望能消弭省籍分歧，因而创办了《旁观杂志》。然而该杂志批评政府政策，并将其与日本的统治相比较，被有关当局视为对党国权威的挑战，结果遭到停刊的命运。此后，鲜有刊物讨论省籍问题，国民党也利用各种政治手段压制省籍问题的讨论。由于省籍族群问题被压抑过久，没有经过适当的疏导和沟通阶段，导致解严之后，顿时如火山爆发一般，熔岩四处流窜。国民政府迁党初期，人民纵或有国家认同的问题，不至于太严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在解严、开放大陆探亲后，国家认同的问题渐渐浮现，使得族群关系日益紧张；加上选举时期的各党派候选人操弄，省籍问题不幸成为台湾一条最敏感的神经，也是造成今日台湾在关键议题上难有共识的要因之一。

相似于台湾因为外来政治权力的介入而产生的省籍族群问题，在中国大陆也曾经发生。最明显的是南下干部问题。中共官方对挑战他们的本地干部，一概以“地方主义”名之。这与国民党来台之初一直将“台湾人意识”当成“地方主义”、“省籍意识”、“区域意识”，¹倒是不谋而合。1950年代初中共当局分配干部南下接收或接管新占领区或实行土地改革，这些干部与当地干部造成的冲突，部分要因实则就是省籍族群冲突而起。不过，目前大陆学者出版的著作中，均以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来解释，完全忽略文化差异等问题导致的族群冲突。²

相对于汉人内部的族群问题，中共更关注的是少数民族问题。中共的民族观在吴启讷的论文已有讨论，兹不赘述。中共民族政策与国民党的最大区别，在于

¹张茂桂：“族群关系”，《社会学与台湾社会》，页222。

²其中提到最多的是广东“地方主义”。陈模：“古大存冤案及其平反”《炎黄春秋》，2001年，期12，页26—31；张江明、刘子健：“广东省‘方方’地方主义冤案始末”，《炎黄春秋》，1995年，期6，页33—38；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页389—394；James Z. Gao（高崢），*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加入了苏联的民族识别经验；“识别”不完全是根据民族学的标准，而是有更多的政治考量。吴文全面剖析了中共的“民族识别”体制与政策，对僮族的分析尤为过去研究所忽视。虽然有大批民族学家参与了民族识别工作，由于受到中共指导思想与党国体制的制约，因而无论是化异为同，还是化同为异，都留下许多后遗症。大陆幅员广大，西南方面的族群问题与蒙古、新疆、西藏很不一样。但是中共为了兼顾 56 个民族，制定的政策，很难包含一切，自然造成困难与问题。最重要的是，中共民族识别的理念和手段在实际操作下，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这些矛盾的出现正好暴露出中共背后的政治目的。

全书之中，唯一同时以两岸作为对照比较的是张中复的文章。它的时间跨度长、议题多；从西方学者的观点到明清以来中国政府如何看待与界定中国的穆斯林，以及台海两岸穆斯林应该以民族，还是宗教来界定自己和汉族的关系，均有讨论。张中复认为，国共均是在族国体制（多民族所形成的国家）的概念下，藉由“汉”与“非汉”人群区隔与共生关系，来形塑民族/族群。国民党的一个“回族”，在中共治下则划分为十个“穆斯林少数民族”（包括说突厥语、伊朗语、蒙古语者）。国民党将汉地回族视为“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是“汉人”的一个分支，虽有主从之别，但基本上不干预其内部生活。中共则视汉回是大家族中平等的一员，亦是少数民族的一支。中共承认回民的非汉身份，也增加了对其政治干预。张文谈的虽然是族国体制，但是“族”的定义最后还是由独大的一党来决定，成为党国体制中的一部分。

国共的民族观及其政策，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两党有志一同的是：为了国家的统一与国防的需要，不容许非汉族有分裂国土的行为。国共两党均号称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实则所施行的民族政策基本上还是从汉人的立场出发。中共指责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同化政策是汉人沙文主义；中共将大量汉人迁入新疆、内蒙、西藏，未尝没有改变民族人口比例，增加汉人影响力的意图在内。此外，国共的民族政策均有因时制宜之处。国民党自南京政府以降向来反对民族自决，来台后治不及西藏时，则又赞成民族自决。¹中共的民族识别法学自苏联，因应中国现实情况也作了调整，将中国的民族由国民党的五族，识别出 56 族来；并进一步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党组织，培养积极分子，训练党干部。南京时期的

¹张遐民：《共匪暴政下之边疆民族》，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8。

国民党一如中共，也曾在边疆地区建立党的组织，但名存实亡，作用不大。¹其次，国民党培植的非汉族干部（中央政治学校边疆干部班），对象以当地上层子弟为主，这与共产党的干部主要来自下层社会，差别很大。再者，中共至少给予少数民族发展自己语言和文化的机会，国民党连这个都没有。

不过，台湾解严之后，多元文化日受重视，政府也逐渐承认并尊重原住民自己的文化。其次，由于原住民对于国民党的政权向来不具威胁性，加上不像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区的少数民族牵涉到政权合法性与邻国的疆界问题，原住民居住的地区也没有资源和战略价值的问题，因此国民党的对原住民的政治控制不像中共控制少数民族那么严厉。

1949年之后两岸政权的分立与分治，并不等同于两岸的分途，并非完全的分道扬镳。虽然国共分属于不同阵营，在意识形态及政治、经济、文化所建立的制度，差异良多，不谋而合的是两党均实行党国体制。

两岸分治后的国共两党莫不急于建立党国体制，试图以党领政，藉以巩固其政权及维护其合法性。蒋介石和毛泽东统治时期，全球冷战形成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当时两岸均处于比较隔绝孤立的环境，资讯不流通，使得党国体制容易建立与维持。不过，从本书各章的结论显示，相较于共产党，国民党的统治其中缝隙更多。以学术建制为例，中共党的组织对学术机构的控制，远比国民党要严密得多；中共在宣传方面亦是如此。这牵涉到两党组织与意识形态强弱的问题，导致国共有不同的取径，因此能够贯彻的程度也大有不同。

众所皆知，毛泽东的形象从延安时期迭有宣传，到了文革因为个人崇拜的盛行，推展到高峰。经过文革的密集宣传，什么是毛泽东的正确形象已经深植人心。正是奠基于此，改革开放后，各种毛像作品的出现，无论出于反讽或嬉戏心理，都是对既有的官方宣传形象的回应或反射。这中间就出现了十分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是中共党国体制宣传系统有效的施行，使得正确的毛形象广为人知。另一方面，对于与毛官方形象背道而驰的作品，正也反映出党国体制出现的缝隙，其根基已经不若改革开放前那么稳固了。同样地，台湾原住民的位阶能从部落提高到

¹ 南京政府时期国民党在边疆的活动及干部训练等，至今在资料和研究方面均严重不足，亟待开发。

民族，亦是受到党国体制松动之赐。在宣传或族群方面，当外来讯息的增加，社会开始多元化，党国体制因而松动所出现的裂缝，成为最值得细究的地方。

不过，历史的发展充满吊诡。党国体制的崩解在台湾部份源于族群矛盾。诚如钱永祥所言，台湾民主化的主要动力之一，来自于过去蒋介石的国民党所不愿正视的族群矛盾。国民党迁台后，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占全岛人口12%外省人手中。由于历史原因使然，本省人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观与外省人有些地方不大相同，而权力集中在外省人手里，造成本省人有很强烈的疏离感。本省人主要走中小企业的发展道路，形成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得到一定的经济力量之后，自然对当时政治权力的分配高度的不满，进而要求开放更大的政治空间。在台湾，所谓“反对者”与“统治者”的矛盾，正好契合族群的界线。族群的区别具有很强的动员能力，族群议题一旦成形，“我们”与“他们”就分开了，阵营的区分非常明确。¹族群问题在台湾遂成为两面刃：一方面促成台湾民主的进展，一方面也因为族群问题与国家认同的纠结不清，造成社会分裂，至今仍难形成全国共识，从而可以共同面对与试图解决国际社会给予台湾人民的种种挑战。

冷战时期，国民党的党国体制较易松动，除了有美国等外在因素，还有另一要素亦须列入考量。那就是国民党不像共产党那样将所有生产工具国有化。中共将所有生产工具收归国营，藉此来控制人民食衣住行育乐等的方方面面，使得老百姓除了依附党国，别无他路可以生存，也因此造就了中共更为严密的党国体制。而国民党虽有大量国营企业，仍允许私人经济存在，这就为社会留了一条活路。凡不见容于国民党的党国体制者，仍可以在私营经济中求存。当这些人形成足够力量，反过来会冲撞党国体制，这也是造成台湾党国体制崩解的另一因。

在讨论国共党国体制异同之余，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面向是中国大陆和苏联的比较。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固然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然而由于文化与国情的不同，还是会产生诸多差异。以本书的三个主题为例，两者在宣传方面颇多契合之处，民族识别政策的异同在吴启讷的文章已有说明，这里仅举出学术建制上的若干差别，作为参考。其一，苏联的党组织不是直接进驻科学院，而是透过科学院的秘书处而存在，并受其所在地的区党部指挥。中国科学院则是将党组

¹黄晓峰、丁雄飞：“钱永祥谈台湾的政治转型”，《东方早报》，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11/12/696153_2.shtml，下载日期：2011年12月3日。

设在院内，直接由中共中央掌控。苏联科学院院长在1951年之前都不是党员，自然科学院士也享有不少质询政府政策的自由。¹换言之，即使在斯大林掌权下的党国体制高峰期，苏联当局对科学院的控制也不若中共严厉。显而易见地，中共比苏共对科学院的政治介入更深。其二，苏联的院系调整重点在于对自然学科作更专门的细分，主要调整工农学科方面，也过度强调其与工业生产的配合。²中国院系调整主要是为了思想改造，人文学科反而成了改造重点。中共严格要求高校教师要服从组织分配。教师若抗拒调配，只有失业一途；最后只能放弃个人生活、兴趣或其他考量而屈从。³这是中共收编高级知识分子关键性的一步。其三，苏联当局对知识分子的尊重远胜于中国。1953年，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稼夫率领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并与苏联科学家举行座谈。当场有些苏联科学家明白表示，中共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简单粗暴”。他们举列宁为例，说明十月革命后不少科学家选择离开，苏联严重缺乏科技人才，当时苏共尽可能地设法挽留科学家，尊重他们的习惯，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优越的条件。⁴反观中国大陆，随着镇反、反右一波高过一波的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却是日益严重。中苏这些差异是如何产生的，亦是值得继续探究的问题。

总之，本书各文提出了许多可以重新思考的问题。我们无意也不可能回答所有的问题；只希望本书能够有抛砖引玉之效，激发更多人的兴趣与关注，投入冷战以来的两岸研究，共同浇灌这块新园地，那么就达到本书出版的目的了。

¹ Vera Tolz,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s: Bolsheviks and Academicians in the 1920s and 1930s,” *Academia in Upheaval: Origins, Transfer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the Communist Academic Regime in Russia and East Central Europe*, Michael David-Fox & Gyorgy Peteri ed., (Westport, CT. & London: Bergin & Garvey, 2000) pp. 59, 68.

² 在这期间，十分窄化的技术教育，甚至取代了党员训练中的马克思社会学科的核心课程。Michael David-Fox, “The Assault on the Universities and the Dynamics of Stalin’s ‘Great Break,’ 1928–1932,” *Academia in Upheaval: Origins, Transfer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the Communist Academic Regime in Russia and East Central Europe*, pp. 83–88.

³ “上海交通大学等五校教师对院系调整的反映”，《内部参考》，期192，1952年8月22日。
⁴张稼夫：“中国科学院的初创工作”，《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期1，页48。例如，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在政治上是反对派，科学院安排六个党员当他的助理，都被他轰出来。但列宁还是尊重他。不但列宁如此，连斯大林对他也是敬重有加。即使巴甫洛夫一再抗议当局不该滥捕知识分子和摧毁教堂，斯大林依然用礼物及给予各种恩惠讨好他。Rachel Polonsky, *Molotov’s Magic Lantern: A Journey in Russian History* (London: Faber & Faber, 2010), p. 189.

【毛泽东研究】

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

唐少杰

欲了解中国现代历史，必须了解“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欲了解文革历史，必须了解毛泽东。“说不尽的毛泽东”的主要所在，就是毛泽东从事文革所“说不尽”的方方面面。作为文革整个历史剧目的“导演”、“原著者”、“编剧”（或“策划”）、“制作人”和“第一号男演员”，毛泽东对于文革具有其他任何人不可替代的情结和不可超越的角色。即使在文革爆发四十多年、结束三十多年之后，毛泽东之所以发动、领导文革而具有的主观因素和客观作用，依然值得开掘和探讨。本文主要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以期有益于理解和把握文革时期毛泽东的心理境况和实践特征。

“情结”（complex）是心理学中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重要术语，指的是一群重要的无意识（或“下意识”）组合，或是一种隐藏在一个人神秘的心理状态中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荣格（Jung）认为，情结是有关观念、情感、意象的综合体。他把“情结”形容为“无意识之中的一个结”，即可以将情结设想成一群无意识感觉与信念形成的结。这个结可以间接获知，而表现的行为则很难理解。弗洛伊德（Freud）认为，情结是一种受意识压抑而持续在无意识中活动的、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欲望。在汉语世界，“情结”还指很深的情感。

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主要表现出的是他个人的心理或意识的蕴涵及其特征，我把毛泽东的这种情结主要概括为五个方面：

1. 君师合一¹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同斯诺（Snow）的谈话中，他认为对他的个人崇拜此时需要“降温”了，在提及文革初期盛行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时，他说：“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

¹ 李泽厚最早提出了毛泽东文革时期的“君师合一”问题，但是没有展开论述。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9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

其他的一概辞去。”¹由此可见，毛泽东特别看重“导师”（Teacher）或“伟大的导师”。不管毛泽东是否听说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所期望的那种由哲学家来统治的国家是最理想的国家（即最高明的统治者应是哲学王），但是毛泽东至少知道，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唯有作为至尊至圣、“万世师表”的孔子的思想影响和精神魅力，超过了几乎所有中国古代皇帝的总和，所以，被称之为“素王”的孔子也是中国千年历史上真正的“无冕之王”。毛泽东在开创、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业中，不但十分重视自己的实践表率作用，而且非常重视自己的精神规范职责。与中国古代历史诸多统治者颇为相似的是，毛泽东极为注重把他的功名事业和价值取向加以教条化、伦理化甚至泛道德化，力图把他的文革思想和文革行动加以理论化和规范化。无论毛泽东把文革视为他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还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之一在于保证他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毛泽东在发动、领导文革的经历中，都把他的“君师合一”情结推向了顶端。

毛泽东“君师合一”的情结，还从他文革时期对秦始皇的赞扬和对孔子的斥责中折射出来。从今天的角度，可以提出一个基于中国历史考察而来的颇为荒唐、颇有意味的“问式”：毛泽东=秦始皇+孔夫子？显然，在毛泽东那里，“秦始皇”是不能与“孔夫子”合而一体的，亦即他要争当“秦始皇”，就意味着必须打倒“孔夫子”。毛泽东要把孔子的地位、影响加以颠覆或消解，他就要试图成为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独一无二的“导师”。在毛泽东“君师合一”的情结中，孔子必须“让位”，这种“师”只有他本人来充当。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师”高于、重于、大于这种“君”，因为他可以拒绝荣膺“大元帅”，也可卸任国家主席，但是“伟大的导师”却是一种超越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终生的追求乃至似乎永远的重任。的确，“伟大的导师”情结，使得毛泽东不遗余力地变换文革由可能走向必然、相对趋于绝对、有限变为无限的运动或价值。尽管毛泽东“君师合一”的情结在文革时期行之一时，但是由于文革的破产，这种情结也随之破灭，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把毛泽东视为“导师”。

2. “接班人”情结

毛泽东的这一情结，既在一定意义上类似中国古代历史上王朝统治者的“嫡

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17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传”情结，又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毛泽东内心的“斯大林情结”与“赫鲁晓夫情结”的综合作用。“斯大林情结”之一，就是斯大林生前所谓没有成功地培养出“接班人”；而“赫鲁晓夫情结”，就是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死后的政治鞭尸直至移尸入坟。这些无疑给毛泽东晚年的心理带来挥之不去的阴影。文革的一个直接动因，就是清除毛泽东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毛泽东在其生命最后二十年所最为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历史对他的评说和后人对他的评价。“历史的评说”和“后人的评价”，汇集成毛泽东晚年的一大幽魂。能否和怎样选定“接班人”，既关乎到毛泽东的历史，也关乎到历史上的毛泽东，更关乎到毛泽东与历史的互动。“接班人”情结，俨然构成毛泽东晚年政治生涯的“命穴”。毛泽东生命最后十余年的一大任务，就是选定他的“接班人”。文革可谓在广义上是毛泽东培养所谓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在狭义上只是培养他自己一人的“接班人”的一场运动。与此同时，文革又是毛泽东培养和选拔其“接班人”，并且无不使其选出的“接班人”走向或废黜、或死亡、或夭折、或更替的历史。从刘少奇到林彪到王洪文到华国锋，毛泽东对于其“接班人”的一系列做法，也反映出毛泽东对于自己的身后信心不足、对于文革的下场忧虑重重。

毛泽东的“接班人”情结及其实践表现富有独特的地方，还在于毛泽东对于“接班人”所做出的“隔代指”，即毛泽东既要选定自己的“接班人”，又要选定其“接班人”的“接班人”。这就不仅不同于以往中外政治极权领袖遴选“接班人”的做法，而且给文革注入了某种致命的因素。毛泽东曾建议自己“钦定”而又为中共党章“法定”的接班人林彪接受张春桥为林彪的接班人，这就使得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很有可能走入不归之路，更有可能致使文革的高层人事变动成为某种宿命。毛泽东或许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过其“接班人”与其“接班人”的“接班人”之间的关系。文革历史证明，这种“接班人”与“接班人”的“接班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双方水火不容、视如仇敌，就是彼此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对“接班人”的“接班人”的指定，“嫡传”接班人对“隔代”接班人的厌恶和否决，后续接班人的更换和最后接班人的惊天之举等等，这一系列的行径仿佛成为注定毛泽东的文革命运的“系数”！

毛泽东文革时期的“接班人”情结，往往致使身居毛泽东之侧的中共中央第二号领导人兼任毛泽东“接班人”的工作和地位，成为中共历史上最难以胜任的

工作和最微妙复杂的地位；同时，也使这类“接班人”处于“一人之下、亿人之上”最为危险的境地和走向被文革历史最终离弃的结局。这种“接班人”情结，还带来了文革时期中共党内党外从中央到基层、从领袖到群众、从领袖到领袖和从群众到群众的斗争，异常残酷、惨烈、复杂和深重。正是由于“接班人”的情结，即使文革不断地自我分裂、衰竭、异化，也使毛泽东不可能成为一位现代民主政治的领袖。

3. 诗人诗化

这一情结不是指毛泽东擅长赋诗作词，而是指毛泽东在理想与现实、未来与当下的关系上具有诗人诗化的情结。毛泽东的这一情结，更多地缘于1958年他期望中国驶入共产主义天堂的“大跃进”运动。在经过了1921年至1949年二十八年的革命斗争（内有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之后，毛泽东力图既使中国崛起，也使他的功名事业趋向前所未有的辉煌。而在1949年之后的二十七年里，尤其是文革十年里，他的治党治国治民的模式，表现出无序而混乱的群众运动、诗人诗化的取向和理想高于一切等等特点。文革时期，毛泽东把他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乌托邦主义，发展到了漫画式的浪漫主义、民粹主义、反智主义。从1958年之后到1976年去世之际，毛泽东的上述模式几乎是不断地从失败走向更大的失败。自1958年之后，毛泽东试图用他诗人诗化的“乌托邦”壮举改天换地，却把中国引入了饥饿、清贫、落后的社会主义天地。1966年之后，毛泽东促使这种“乌托邦”变成对亿万中国人民的活生生的极权制约和泛道德化的专政。

毛泽东的“诗人诗化”情结，在文革时期绝不是什么如歌如画如诗如戏的情结，而是理想凌驾于现实、未来强制于当下的情结。这种情结进而化成文革的“魔影”，无不时时、处处钳制文革的方方面面；即在文革时期，似乎一切都取决于与未来的关系、全部生活都依赖于与理想的关系。换言之，现实的价值由未来所裁决，当下的意义由理想来充填。这也就必然导致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现实或当下，不断地被未来或理想所否定、愚弄、绑架直至专政。然而，“未来”究竟是什么，“理想”又在何方，这只能取决于毛一人任意的勾勒或涂画。这类“未来”和“理想”是否经得起质疑或批判，可否成立或实现则化为永远的悬念。文革时期诸多的未来和理想，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魇，就是可欲而不可求的幻觉。

1949年之后，新中国所逐步建立或实施“党—国家—社会”三位一体的社

会结构和社会运作。文革时期经过毛泽东“诗人诗化”情结的作用，出现了更大更广的乌托邦主义价值追求，凝聚了泛道德化的民粹主义实践取向，陷入了屡遭重大挫折的窘境。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写给林彪的信（即著名的“五七指示”），既是文革社会理想和社会建构的一个“蓝图”，也是毛泽东“诗人诗化”情结的聚集映现。文革也可谓毛泽东诗人的诗化运动和诗化的诗人政治，只不过这种运动的浪漫、炫耀，是与这种政治的破碎、灾难成正比的。从毛泽东“五七指示”所憧憬的“工农商学兵”一体同构的民粹社会，到文革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诸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革命文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的全盘铺排；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到文革后期各行各业千百万大众以诗歌朗诵会的方式补缀文革的破败，这些都一再表明了文革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最久的一次“乌托邦”社会实践，而毛泽东的“诗人诗化”情结，就是文革“乌托邦”的绝唱。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诗人诗化”情结所造成的牺牲、损害和浪费，难以估算，这也注定了这一情结成为历史的噩梦。

4. 世界革命领袖

自中国与苏联分歧、论战和分裂之后，毛泽东的“世界革命领袖”情结日益增长；到了文革时期，达到了顶点。据坊间所传，斯大林去世后不久，毛泽东就说过：“我一生打遍天下无敌手，最大的遗憾就是同斯大林打了个平手。”的确，自斯大林去世之后，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没有哪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袖在经历、业绩、名望、魅力甚至形象上堪与毛泽东相匹配。毛泽东1958年带领中国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之际所提出的“超英赶美”（即“七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今天应该解读为要超过苏联；因为赶上了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苏联就不在话下。对于苏联，毛泽东当仁不让。他不仅期望中国坐上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龙头老大的交椅，而且他自己要成为继列宁、斯大林之后的“世界革命领袖”。由于中国国力不足，最主要的是稍后持续数年的全国性饥荒，毛泽东“世界革命领袖”的情结受到抑制。

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这一情结一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二是上升到了理论学说的层面。在前者，毛泽东被誉为“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北京取代昔日“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成为“世界革命的圣地”，昔日“农村包围城市”

的中国革命道路转换为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由落后民族、不发达国家包围西方发达国家的革命道路。中国要取代苏联，开创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新中心。在后者，《人民日报》为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所发表的社论¹，把毛泽东的这一情结和相关的观点，系统地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第三个里程碑”，毛泽东成为了世界革命的领袖兼导师。实际上，这种世界革命，更多地是限于不同地区的民族革命或农民革命，而决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革命，更不是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文革最初的五年，自中国与美国实现了双方最高领导人的对话和联系之后，毛泽东“世界革命领袖”情结的“革命”色彩大大减退。因为毛泽东所采取的“联美反苏”的策略，把中国过去革命的、激进的、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外交政策，转换为当下务实的、温和的、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外交实践。这些尽管是对文革理论和文革实践的某种解构，尽管显现出文革国内意识形态与文革外交政策的张力或反差，但是却没有消解毛泽东的“世界领袖”情结。在文革时期的外交领域，毛泽东体现出来的与苏联对着干而决不调和的举措和气魄，对美国既联合又批评的做法和风范，意味着毛泽东要在美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和苏联以及东欧国家集团的“两极世界”之外，建立一个以毛泽东的中国为最大国家的“第三世界”。作为“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者，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想要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精神领袖。“三个世界”的理论并不符合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也不符合正统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很难有持久的生命力。但是历史地来看，它更符合毛文革时期的“世界革命领袖”情结。

5. “马”表“法”里

这里的“马”，是指马克思主义；这里的“法”，是指中国古代法家思想和理论。文革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宗旨最初被“红卫兵”和“造反派”诠释为毛泽东二十多年前说过的“造反有理”，后来演变为“阶级斗争论”、“继续革命论”和“全面专政论”三足鼎立的文革意识形态。具体言之，这“三论”就是指社会主义条件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三论”的关系，旨在由“阶级斗争论”演进到“继续革命论”而推进到实施“全面专政论”。²从毛泽东早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民粹主义、道德

¹ 《人民日报》1967年11月6日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

² 具体地说，就是从注重“身份论”、“血统论”的“阶级斗争论”（“整治论”），到时间与空

主义、实用主义式的理解和运用，到他晚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我论、唯权力论、唯意志论的改造和应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史上独特的一大变种。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既肤浅、通俗，又零散、混乱，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但却有着文革特有的实践效用和功利价值。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更多、更主要地表现为心理经验层面和日常行为层面的说词，没有什么理论著述。¹

显而易见，毛泽东“‘马’表‘法’里”的情结，在文革中、后期赤裸裸地表现为毛泽东更加看重和惯用的是法家的东西。毛泽东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通谙熟，在文革时期尤为体现在他对法家的主张和方法的融会贯通直至践履力行。毛泽东深切地意识到，中国古代千年历史的儒、法、道、释之间的关系，就是“‘儒’表‘法’里，‘道’、‘释’补充”，而法家所强调和推行的“法”（法律、法制）、“势”（权力、权威）、“术”（政治驾驭手段），比起儒、道、释诸家来更为可行、更为重要。法家思想和学说，可谓中国古代版本的“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其主旨就是千方百计地维护和扩大君主权力和君主权威，其真髓就是不遗余力地奉行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了实行恐怖不计结果、民众畏惧自己更有效于民众热爱自己等等君主统治的准则。冯友兰早在1949年之前就写道：“谁若想组织人民，充当领袖，谁就会发现法家的理论与实践仍然很有教益，很有用处，但是有一条，就是他一定要愿意走极权主义的路线。”²毛泽东在文革时期所实施的极权主义策略和行径，无不与他的法家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点，在“批林批孔”运动以及“评法批儒”的宣传中达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从毛泽东文革时期再次自称“秦始皇”到他对法家的厚爱或垂青，从毛泽东对文革国内大局的掌控和党内高层人际关系的操纵到他对文革国际格局的设计和外交政策的制约，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明地闪现出法家的阴魂或幽灵。毛泽东认为，他在文革时期坚持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心目中的这种

间转换的社会阶段革命和世界范围革命的“继续革命论”（“折腾论”），再到“道德独断论”、“生活各个领域的专制”的“全面专政论”（“迫害论”）。

¹ 文革十年，毛泽东所写的超过一百字以上的书信和文章只有五个：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信，同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同年8月5日《炮打司令部》，1967年8月4日给江青的信（没有发表），1970年8月31日《我的一点意见》。其中公开发表的两封信件和两篇文章，只有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近1800字，其他的都没有超过800字。毛泽东文革时期没有写过理论文章。

²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15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马克思主义，实质上通向了法家的观念和策略。因此，不难得出结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家化。荒谬，然而却是事实！

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诸多情结既有内在的关联，也有相互的张力和抵牾。这些方面深刻地展示出，文革总体意识恰如一座中国囿于前现代性时代、憧憬现代性¹生活、警惕后现代性因素的图景中的叠嶂。

如果说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过多地表现为他个人的主观因素或意识特质，那么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角色，则主要标志着他个人的客观作用或历史职能。“角色”（role）一词源于戏剧，后来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个体在社会舞台上的身份及其行为。角色本质上反映一种社会关系，体现的是与社会地位相一致的社会限度的特征和期望的集合体。社会学所指的“角色”，更多地是“社会角色”的简称，指个体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身份和由此而规定的行为规范、行为模式的总和。质言之，“角色”就是个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相应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并按照一定的社会期望，运用一定权力来履行相应社会职责的行为。

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角色，主要表现出的是他个人的地位或职能的蕴涵及其特征，我把毛泽东的这种角色主要概括为五个方面：

1. 上帝—神

毫无疑问，毛泽东文革时期是中国至高无上、无出其右的人物。文革时期全民性的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最广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是由毛泽东所认可、怂恿、操纵并又在文革中后期加以节制的。毛泽东把这种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视为他发动和领导文革的一个合理的、可行的前提。也正是基于这种独一无二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毛泽东才成为了文革的“上帝—神”。这里所说的“上帝—神”，既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上帝”，也不是世俗生活意义上的“神”，而是指毛泽东本人成为文革时期中共党的机制的绝对准则，新中国国家运行的唯一标准，日常生活道德伦理规范的最终依据和亿万民众心目中的最高权威。例如，文革初期广为流传和遵行

¹ 这里所说的“现代性”，主要是指自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的近、现代世界历史的精神文明进步过程，主要体现在公正、民主、法治、宪政、人权、非暴力、博爱、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等等的实施和普及。

的“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大树特树”¹等等政治风尚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本人亲身经历和见证过的文革初期对毛泽东顶礼膜拜的日常仪式化、符号化和秩序化，更是确切地反映了这一点。我还清晰地记得，我们在文革时期与他人之间的交往或交流或交谈中，一旦出现了矛盾、分歧、争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引用毛泽东的“权威”，每每以说“我向毛主席保证……”或“我向毛主席发誓……”来说服对方、证明自己。经过潜移默化的文革日常政治的运作，“毛主席”真正成为亿万百姓从头上到心中的“上帝一神”。

毛泽东在文革时期“上帝一神”的角色，是与他同一时期政治上的极权和精神上的独裁相辅相成的。唯有这种角色才可以保障这种极权和这种独裁通行开来，也只有这种极权和这种独裁才可以确证这种角色畅行无阻。这种角色更多地显现出文革政治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直至专制主义的特色，更大地聚集为整个文革历史过程及其各个阶段的“底色”。

毛泽东自己相信不相信他所放任和纵容的对他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以毛泽东具有的智力和智商，能不能看出对他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荒唐和可笑？从前面所引的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中，完全可以证明，毛泽东把这种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当成权宜之计，当成文革得以发动和进行的一个必要条件，进而，表明他本人并没有自我陶醉或自我迷惑于这种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所以，毛泽东依靠或利用对他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完全是为了保证、维护、巩固他那似乎不可动摇、不可替代的文革最高地位、最高权威的作用和影响，亦即“上帝一神”的角色及其职能。只有充当这种“上帝一神”的角色，毛泽东才真正有可能成为文革的毛泽东！文革中、后期的一系列危机和弊端，削弱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在这种迷信和崇拜不断淡化、衰变的同时，偶像趋于假象，神化的过程走向神话的土崩瓦解，“上帝一神”角色的结局，完成了这种“上帝一神”角色的分崩离析。

2.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式的改革家

“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可能是文革时期毛泽东最富有吸引力或最具有

¹ “四个伟大”指“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三忠于”指“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指“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忠诚毛主席”；“大树特树”指“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魅力的角色。16世纪初期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不仅改换了上帝与信民、信仰与信徒、罗马教廷与世俗国家（即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且改写了基督教历史、德意志历史乃至欧洲历史。马丁·路德所倡导的“内心信仰”、“因信称义”、变革基督教教会及其职责的主张等等，扭转了欧洲中世纪的发展方向。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对于后人、后来历史的精神启示或激励，往往超出了这一改革当时的实践意义或作用。无论毛泽东对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有无了解或有多少了解，根据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所作所为，确实可以把毛泽东的角色同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角色加以比较。从“上帝就在我心中”这一宗教改革所带来的资本主义伦理精神的喷薄欲出，到“革命倍觉北京近，造反更知主席亲”这一文革初期所形成的群众造反心理活动的横空出世，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角色及其一些做法，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做法有着形式上的相似之处，即他们都是从上层着眼、从下层入手。从马丁·路德所推行的基督教的世俗化、民族化，到毛泽东所倚重的文革的全民性、草根性，不难看出，像宗教改革、文革之类的社会运动，都是由它们的肇端者所掀起的“触及灵魂”（用文革术语来说）的民众运动。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之际，充分估计到了并且相信广大群众会积极响应他的文革鼓动和号召。他直接呼唤出“红卫兵”这一文革初期的“天兵天将”，他打开了“造反派”这一文革政治的潘多拉盒子，他惯于把党内斗争与党外斗争加以彼此互动，他善于把高层斗争与基层斗争加以双向引入，他同情“小人物”和擅长“打群众牌”，他持续不断地把“群众运动”演变成“运动群众”，等等，这些都既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国家和党的治理体制，又改变了中共党和国家过去惯常的运作机制，更使中国游离出以莫斯科为中心、以“苏联模式”为圭臬的社会主义传统。毛泽东文革时期改写了中共党和国家的“正统”历史，重塑了中国的形象，这种改写和重塑所造成的影响或遗迹，至今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都不会消失。因为，毛泽东“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赋予文革本身固有的一种“范式”：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如何处理？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如何解决？尽管今天可以说文革是一种历史的破产或是所谓“历史的试错”，但是文革曾经力图处理、解决的上述关系和矛盾，则意味着共产党有没有可能脱离人民，干部有没有可能背离群众这类问题远没有过时或没有解答。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唤起了民众而又最终恐惧民众，这也注定了这种宗

教改革不可能成为宗教革命。与之多少相似的是，即使毛泽东锤炼出文革颇具价值的上述党民关系、干群矛盾的“范式”，但是作为文革最大“造反派”兼文革最大“保皇派”的毛泽东本人，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类问题。

3. 现实的世俗领袖

毛泽东不仅仅是文革时期的“上帝一神”、“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他同时还是文革“现实的世俗领袖”。作为中共党的最高领袖、新中国的实际元首和解放军的统帅，毛泽东不可能无限地膨胀他的第一种角色，也不可能任意地放大他的第二种角色，他必须时时、处处把这两种角色置于其“现实的世俗领袖”这种角色的制约之中。毋庸置疑，不管毛泽东怎样试图把文革的尘世打造成文革的天国，不管毛泽东怎样尽情地挥舞文革的“千钧棒”，把中国大陆社会打得“天翻地覆慨而慷”，这些都必须以确保他的上述最高领袖、元首和统帅的权力和权威为前提，以不能动摇、不能颠覆他作为文革的最高主宰者为底线。

因而，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诸多角色之间具有内在的张力(tension)。在毛泽东那里，不可能是“上帝的事情上帝管，凯撒的事情凯撒管”；“上帝的事情”与“凯撒的事情”常常是纷乱芜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或是“上帝的事情”充当了“凯撒的事情”，或是“凯撒的事情”扮演了“上帝的事情”。毛泽东文革的诸多角色之间的嬗变或演进，既使毛泽东在文革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不断的自我异化，又使他本人在文革的各个阶段或时期不可逆转地居于经常的自我否定。这也就完全有可能出现今日毛泽东反对彼日毛泽东、此一毛泽东背离另一毛泽东、前面毛泽东消解后面毛泽东的境况；这种境况在文革之中比比皆是，不一而足，形形色色，无以复加。这种境况甚至成为了文革自身的痼疾。

尽管在文革最初三年里，毛泽东更多地表现出其“上帝一神”、“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的角色，而文革后七年毛泽东更多地施展出其“现实的世俗领袖”的角色，但是文革的历史和文革的逻辑，反复证明了毛泽东更加看重和更多展现出来的是其“现实的世俗领袖”角色。即使是在文革最初的三年里，这种角色也有其独特的表现。例如，毛泽东为了“天下大乱”，他可以使“党权”暂时无序、“政权”一度混乱而过分倚重“军权”，军队全面介入文革，“军权”相对于“党权”、“政权”而迅速攀升，日显至关重要，必然出现那种毛泽东曾经反对过的“枪指挥党”的局面。此时，他本人不得不带头认可和接受“枪指挥文革”的局面。

稍后，毛泽东为了“天下大治”，重整文革初期的党权—政权—军权之间的关系，恢复“党权”，重建“政权”，抑制“军权”，仿佛使它们又回到了表面上的三者鼎立的状况。但这却促使林彪事件爆发，由此所引发的文革的最大危机表明，毛泽东的“上帝—神”、“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现实的世俗领袖”这三种角色之间是根本不可能和谐一致的；表明毛泽东这些角色的关系，造成他本人陷入从角色分裂到人格分裂再到更大的角色分裂的难以自拔的境地。毛泽东“现实的世俗领袖”的角色或多或少地延缓了文革战车的突飞猛进，或多或少地保证了文革只能是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亿万人民置身于其中的所谓“内乱”，而不可能是结束或推翻毛泽东的文革的所谓“动乱”。所以，文革不是真正的革命，毛泽东也不是真正的文革“革命家”！

4. “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转换

毛泽东在文革之前就讲过“马克思加秦始皇”。¹ 尽管人们对毛泽东的这种讲法有不同的诠释，尽管有关学者认为毛泽东的这种讲法是强调当时“大跃进”时期经济工作中的民主与集中的关系，² 但是，毛泽东试图应用把马克思与秦始皇加以综合起来的某种东西来治党治国治民，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至于毛泽东是否具备并表现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角色，至少毛泽东在文革之前就明确地自称为“秦始皇”；虽然毛泽东没有自称过中国的“马克思”，但他在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间自视为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毛泽东那里，“马克思加秦始皇”不仅仅是一个讲法的问题，而是一个做法的问题。其实，文革时期，“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讲法和做法都发生了非常值得探寻的变换。纵观毛泽东一生，他对马克思的重视，大致上可以说，1956年之前是重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而在1956年之后，是重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一生没有创建、没有参加任何一个政党并且没有治党治国治民经历的马克思，不可能给毛泽东提供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在其生涯最后的二十年里，尤为关注的是斯大林的专政实践经验，而不是马克思。斯大林专政下的“农业集体化”、“大饥荒”、“大肃反运动”以及党内高层持续不

¹ 这是毛泽东在195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一次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所讲的，原话为“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² 参见许全兴：《“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出处和本义》，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2卷第3期，2009年5月。

断的“大清洗”等等，都在中国孳生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翻版”。强调这一点，是为了表明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角色重心已由马克思转向了斯大林。文革时期，毛泽东与秦始皇的关系更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话题。不过，在我看来，毛泽东尽管在文革不同场合自称“秦始皇”，但是其“秦始皇”的角色却发生了某种微妙的改观，即已经不完全是毛泽东在文革之前所自称的“秦始皇”。最主要的一个具体体现，就是从吴晗的著述和命运中所折射出的毛泽东与朱元璋之间的历史关联。1948年11月，毛泽东两次与吴晗晤谈。对于吴晗送来的朱元璋传记稿本，毛泽东批评吴晗对朱元璋的“暴戾”、“滥杀”、“专权”等指责过多，评论不当。在两次晤谈之后，毛泽东写给吴晗的信中，他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指责吴晗的历史观“错误”。在其1960年代初出版的《朱元璋传》一书，吴晗以“奉命史学”的做法，把朱元璋由过去的“僧钵到皇权”改写成了“农民革命领袖”。尽管如此，吴晗稍前所写的并不涉及朱元璋的《海瑞罢官》剧本，却成为文革的第一个祭品；后来，成为文革头号笔杆子的姚文元受毛泽东的指使而对该剧本的挞伐，正式拉开了文革历史大剧的序幕。朱氏皇权的因素与文革的渊源有着微妙的关联，明王朝的某种历史污迹流淌到了文革的泥塘。即使毛泽东本人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间对朱元璋没有表示过明确的批评或赞扬，但是他对朱元璋的生平事业和政治经验谙熟于心，应用自如，1972年12月毛泽东制定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一著名的国策就是典型的例证。毛泽东以及整个文革与朱元璋这位贫苦农民出身的农民起义领袖兼农民王朝开国皇帝的历史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¹

这里，并不是说，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角色就是“斯大林加朱元璋”，而是说毛泽东所讲过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做法，充满过多过重的“斯大林加朱元璋”的因素，亦即文革之前和文革时期毛泽东“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角色，已具有了“斯大林加朱元璋”的蕴涵或取向。

5. 超非凡魅力 (Charisma)

文革时期毛泽东所充当或所扮演的多种角色，构成为特定的一体，这也就带来了毛泽东的文革“角色丛” (a role set) 问题。如果说这些角色具有各自与文革不同的特定关系，即“上帝—神”的角色凸显的是毛泽东的个人权威，“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的角色凝聚的是毛泽东与群众的关系，“现实的世俗领袖”

¹ 参见王毅：《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上、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突出的是毛泽东与他自己的当下的关系，“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转换角色映射的是毛泽东与其所受到的中外文化及其代表的影响的关系，那么这种“超非凡魅力”的角色，展现的是毛泽东与文革之间的综合性的或总体性的关系。社会学家韦伯（Weber）所用的“超非凡魅力”一词，是指领袖人物具有的超凡气质和神秘的个人魅力，它具有三种类型：传统型、法理型、个人魅力型。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超非凡魅力”角色，主要体现在他的个人魅力型上。由于毛的去世，而使这种个人魅力型的角色不复存在，这种角色就有可能持久地表现为传统型的角色上。毛泽东的“超非凡魅力”角色，主要反映出的是毛以及文革与“大历史”的关系。

文革源于千年中国文化的转型、百年中国危机的演变和数十年中共党内的斗争。它的一个重要缘由，就是中国1911年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历史的“撕裂”，即这一革命结束了皇权制度，终止了约两千年的“皇权—绅权—族权”三位一体的社会历史结构。但是它所遗留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社会如何重建？中国文化如何重构？1911年之后二十年不止的军阀割据混战、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共两党的决战，表明了当时整个中国没有能力进行这种重建，没有力量完成这种重构。1949年之后，只有毛泽东以及中共党才真正有可能从事这种重建和重构。早在1928年，毛泽东就基本上找到了这种重建和重构的方式，即通过“（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建立红军的方式，扩大到中共党所占据的每一根据地“（党）支部建在村上”的方式，并由农村党支部建立起相应的农民群众组织（“贫协”）、农民武装组织（“民兵”）、农民妇女组织（“妇联”）、农民青年组织（“青年团”）直至十余岁少年组织（“儿童团”），同时由于进行史无前例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而使广大农民获得的初步解放，共产党就从根本上不同于国民党而赢得了人民大众。毛泽东过去所说的中共具有的“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三大法宝”，今天看来应该改写为“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群众运动”。毛泽东领导中共以“党—军队—农民”为主线的革命斗争，迎来了1949年之后逐步建立或深化了在中共党的绝对一元化领导下的“七大制度”¹，初步完成了中国古代、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转型。但是，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主题——“全球化”（即中国能否和如何走向世界）以及1898年以来的

¹ 即单位制度、户籍制度、城乡街居制度、人事档案制度、农业集体化制度、“党干”制度（即党对干部的管理制度）、“党军”制度（即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

四大问题——“独立、统一、富强、民主”，依然是新中国面临的重任。自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试图以“革命”的方式加速完成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变和改造，以大大小小五十余场“革命运动”来治党治国治民。毛泽东的“超非凡魅力”角色，实际上定格于“革命”。作为大半个20世纪解决中国社会历史矛盾和危机的首选之举，“革命”仿佛成为毛泽东的新中国立国之本、建国之基。文革既推动革命的毛泽东登峰造极，又促使毛泽东的革命全盘滑坡。无论今天人们把文革说成是“比赛革命的革命”，或是“没有革命的革命”，还是“革命的革命”，文革既是中国现代革命所带来的聚合与裂变、创造与异化、成功与失败的不二法门，也是毛泽东的革命的自我棱镜。毛泽东的“超非凡魅力”角色，是中国20世纪革命的休止符！历史地看，毛泽东的这种角色非常类似于俄国的彼得大帝、列宁和斯大林诸多角色集于一体的角色。对于俄国而言，彼得大帝近似革命大帝，列宁近似革命教皇，斯大林近似革命君王。而在毛泽东那里，俄国改换为中国，他把上述角色熔为一炉，陶冶锤炼，把其“超非凡魅力”角色乃至其全部角色推向了文革历史的峰巅。换言之，“中国的彼得大帝、列宁、斯大林”是连为一体的，不是分隔开来的，亦即没有单独的“中国的彼得大帝”或“中国的列宁”或“中国的斯大林”。

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诸多角色，既有内在的综合和转化，也有相互的矛盾和冲突。这些方面深刻地显示出，文革历史过程本身恰如一处中国身居前现代化时代、心系现代化¹生活、受挫于后现代化因素的长河中的岔口。

总之，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已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当今中国如何认识自己和如何实现自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中国现、当代历史和未来历史如何变革自身和如何创造自身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因而，本文最后提出的并且不做回答而留给读者思考的问题就是：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的问题及其影响，在中国消失了没有？过时了没有？反思了没有？告别了没有？

¹ 这里所说的“现代化”，主要是指自18世纪末期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近、现代世界历史的物质文明进步过程，体现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法制化、教育普及化、科学技术日常化、社会福利化、交通电气化、交往电讯网络化、生产一体化、资本国际化乃至“全球化”等等的指标和成果。

【毛泽东研究】

“五七指示”：毛的理想社会模式及其破产

余汝信

196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以中央名义，转发了毛泽东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这样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¹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后按写信日期简称“五七指示”，多为人所知。所附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本来不过是一件普通的工作简报²，毛泽东借题发挥，洋洋洒洒一大通，将其赋予了特别的政治含义。

文件原规定仅发至县、团级党委，不登党刊。1966年7月31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同意湖南省委的建议：将中央转发的《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像一九五九年主席的六条指示信（党内通信）一样，印发到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的基层支部中去，直接向广大党员和群众宣读，并认真组织讨论。文件由支部委员会负责保存，经常检查执行情况，每年向群众宣读和组织大讨论一次或两次”。³

8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分别发表纪念建军三十九周年社论。社论同时用黑体字公开了经过文字修饰的“五七指示”的主要内容。《人民日报》社论称：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

¹ 中发[66]271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央转发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1966年5月15日。

² 诚然，用今天的眼光看，报告内容本身也有一定的问题。如围湖造田，就违反了自然规律，人为地破坏了生态平衡，得不偿失；军队搞生产，组建了大量非作战部队，既加剧了军队的膨胀臃肿，又为文革之后发展为军队大规模经商创造了条件，危害巨大。

³ 中发[66]389号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印发“中央转发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的通知》，1966年7月31日。

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从而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避免城市和工业的畸形发展，就可以使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

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大大加强我们的战备工作。帝国主义胆敢侵犯我们，就会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

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十年来就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办事的，现在还在不断发展提高。解放军是最好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全国的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学校、商店、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要以解放军为榜样，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¹

“五七指示”是毛泽东逆社会发展潮流的、军事共产主义思维的产物。其思想根源，滥觞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信仰。

毛泽东早于1919年便服膺于“新村生活”的构想。所谓新村主义，原为二十世纪初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所提倡。武者小路实笃心目中的“新村”，人人平等，人人劳动，财产公有，各取所需。1918年底，武者小路实笃甚至还在日本九州岛宫崎县内购地40多亩，建立起“新村支部”，信众始为19人，后发展至22人。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六卷三号发表了《日

¹ 《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1966年8月1日。

本的新村》一文，详细介绍了武者小路实笃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引起了颇大反响。一时《新青年》、《新潮》、《国民》、《每周评论》等刊物，都对新村主义进行了介绍。与此同时，工读互助主义也在中国悄然兴起，一部分青年远渡重洋出国勤工俭学，一部分则将其与当时流行的互助论、新村主义相结合，形成一股工读互助主义的思潮。工读互助主义与新村主义相类似，其特征为：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一边读书，一边工作。¹

1919年12月，毛泽东将其草拟的新村计划书中的一章——《学生之工作》发表于《湖南教育月刊》。毛的新村，是从创造新学校始，“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新学校中的新学生，为创造新家庭之成员。“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举其著者，如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毛泽东还认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²

青年毛泽东要将其乌托邦式的新村计划试验于“湘城附近”，无论有否去试验或试验成功与否，均无伤大雅。问题是四十年之后，毛泽东已是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的“伟大领袖”，一旦要将全国都作为实现他那些花样翻新的乌托邦式理想的试验场，破坏力不可谓不惊人。

新的乌托邦，叫人民公社。

1958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了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引述了这样一段话：“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在这句话后面，陈伯达有一段说明：“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

¹ 胡长水、李瑗：《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页122—123。

² 胡长水、李瑗：《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页124。

现实生活的试验所得的结论。”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称：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¹8月29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在决议稿上加写了一段话，内称：“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质量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产主义时代。”²

北戴河会议甚至断言：“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翌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全国各省、区、市委（缺西藏）电话会议，听取各地汇报办人民公社的情况。据汇报：目前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已经到来。河南已经全省实际公社化，河北、北京市郊区9月10日前可实现公社化，山西、山东、上海市郊区9月半可实现公社化，其它大部分省正在总结试点经验，逐步展开，估计9月底前均可实现公社化。只有内蒙、福建、新疆三个地方，9月搞试点，秋后铺开，计划到今冬全部搞完。至会前统计，全国农村已建立九千零三十四个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少数是数乡一社，除河南武修县外，山西、陕西、青海也有个别县实行一县一社。最大的社已达六万四千户（山西高平县），最小的不到一百户（黑龙江一个公社，但方圆有八九十里）。³

1958年11月4日，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第134期刊载了《山东范县

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页318。

²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360。

³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402—403。

提出一九六〇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报道了该县人民公社党委（即县委）第一书记关于范县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报告的摘要。内称：“到1960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到那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种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毛泽东头脑极度发热，批示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还，会后出征，以为如何？”¹

同年11月21日，中共湖北省委作出关于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的指示（草稿），主要内容为：（一）“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即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目前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它是人民公社在现阶段应当实行的一种比较适当的分配方式。（三）目前各个人民公社以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较为适宜。（七）要把推行工资制和供给制当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当月武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此件请印发到会各同志研究”，实质上对王任重为首的中共湖北省委的做法是赞同的。

同年12月7日、10日，毛泽东为印发陈寿《三国志》中的《张鲁传》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与会者，两次写了批语：“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研究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三世，行五斗米道。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

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494—497。

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若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¹

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毛泽东将他的批语与《张鲁传》一并印发予党内高干，缘由是他认为，他所倡导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历史上农民起义建立的张鲁政权在许多做法上十分相似：“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甚至他心目中理想的工农商学兵“政社合一，劳动武结合”，也类似张鲁政权“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故而，“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毛泽东不仅要求普遍推广人民公社，而且还要求推广军事化的民兵师组织。1958年9月，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后对新华社记者谈话时称：“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²军事化与人民公社化伴随而生。11月10日，毛泽东批示要“研究一下”的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的报告中也说：“这里的劳动组织完全按军队那样编成连和营，劳动是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很严，为突击收秋种麦，还组织了一个野战部队，在地里吃饭宿营，是劳动中的一支突击力量。”³

人民公社实际上是一个利用行政性权力，超越社会发展的现实阶段，赋予强烈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和军事共产主义形式的畸型混合体。到了1959年，人民公社的名称虽还保留（且一直存在到文革后的1984年），但实质内涵已有极大变化，供给制、公共食堂、免费吃饭等等已不能再实行，所谓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狂妄计划，只不过给历史留下了一个笑柄。接下来的1960年代的头三年，中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过日子。始料未及的是，1964—1966年初国民经济刚刚有所恢复，日子刚刚好过了几天，毛泽东头脑中左的一套又故态复萌。“五七指示”，就是承继和发展了人民公社运动极左的空想社会主义——军事共产主义思维的典型。

“五七指示”所描绘的，是毛泽东头脑中的所谓理想社会的模式。王禄林在《〈五七指示〉初探》一文中认为，毛泽东这一模式有如下的特征：

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627—629。

²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430。

³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523。

(一) 一个逐步消灭分工的社会。“五七指示”要求军队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兼起来”，“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按毛泽东的理想，其发展前景是，每个单位都有工、农、学、兵，从而可以成为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的“小社会”。这样发展下去，不仅社会各行业之间的专业界限将逐步消失，而且“小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也都能“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工界限也逐步消失。

(二) 一个逐步消灭商品的社会。王禄林认为，“五七指示”中要建立的“大学校”，与人民公社有一个重要区别：人民公社内部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而“大学校”里只有工、农、学、兵，砍掉了商业。王禄林还认为，经过1960年代初期的几年思索和研究之后，毛下了决心要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制度，办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大学校，是他设想出的消灭商品的途径。从“五七指示”发表一直到毛逝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动摇过。

(三) 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毛泽东设想的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制度，根本目的是要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毛泽东所追求的所谓消灭三大差别，不是用发展生产力的办法，是用平均主义的办法来消灭三大差别。“大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做点工，务点农，学点军事、政治、文化，这似乎就达到了每个人在参加劳动和接受教育方面的平等。文革中，毛泽东要求没有经过“大学校”的，所谓由旧学校培养的学生，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知识分子、工宣队、贫宣队管理大、中、小学；干部轮流进“五·七干校”，等等。王禄林认为，显然，毛泽东构想的是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¹

我们倒认为，毛泽东要构建的，决不是一个什么理想国，而是一个与世界发展潮流、与普世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怪胎。在“五七指示”中，毛强调，军队“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工人、农民、学生统统“也要批判

¹ 王禄林：《〈五七指示〉初探》，载《回首文革》（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页161—172。

资产阶级”，而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深恶痛绝，不言而喻。然而，事实证明，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四十年，资本主义显得比毛式“社会主义”有活力得多！“五七指示”中军事共产主义的色彩，更甚于人民公社化时期，其中体现出来的毛的“理想社会”模式，更接近于试图将整个中国社会工、农、学、商各行各业全面纳入一个划一思想、划一意志的军事化大兵营（美其名曰“大学校”）。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样一个社会模式，其实不是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距离很近吗？！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夕，毛泽东写这样一封信给林彪，中央文件的标题也突出了这是“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毛的本意，值得推敲。是否有借用林彪在军队中的威望，并谋求在地方上也树立林的威望，以换取林彪的支持，以求在军队及全国顺利遂行毛的个人主张之意？

在毛写了这封信之后，林彪内心是否支持毛的主张？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毛泽东这类军事共产主义的思维模式，倒是并非军人出身的张春桥曾在1958年就阐述过并得到毛的赞赏。张春桥当时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中即称：“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张春桥还称：“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¹张春桥将战争年代军队中的供给制美化，并要将其延伸至和平年代的全社会，其思想之“左”，比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

张春桥与毛泽东思想的接近和“理解”，是否就是毛泽东晚年“换马”，要抛弃林彪这位毛认为已是尾大不掉的“换班人”而换上张春桥的主要原因呢？

就在毛泽东津津乐道他那限制并消灭商品生产、将原始共产主义式的所谓“公平”作为最高目标，不以社会效率为价值取向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想国”

¹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

的当月，中国实际上已揭开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国家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此后十年，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物质极度匮乏，武斗连续不断，整个中国大地满目疮痍。

相反，同一时期的西方各国，却是另一番气象。一度被认为是“垂死”“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其经济正经历一次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都在3%以上，西德达到6%，日本则达到9.3%，个别年份甚至超过15%。战前和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科技成果被大量转移至民用，一大批崭新的行业被建立起来，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战后西方各国大力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调节，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使经济增长得以保持强劲势头；西方各国政府在战后都着手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大大缓和了阶级对立情绪，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¹

以毛泽东的所谓“理想模式”改造中国，事实证明，此路不通！在整个1960—1970年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西方各主要国家大大地拉开了距离，个中缘由，难道还不值得国人反思么？

2013年11月

¹ 参见龚学平主编：《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科技竞争》，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评论】

不为尊者讳，不为自己隐

——读《良知的拷问》兼谈文革回忆录的写作

阎长贵

写回忆文章，最难的是真实。如果失实，这样的回忆录比废纸更误人。要么不写，要写，就写真实的我，写我的真实。

——孙怒涛

心地善良是做人的根本。社会要以人为本，人要以善为本。

——但燊

从《良知的拷问》这一书名谈起

十几年来，文革回忆录我读过不少，至少也数以十计了吧，但把回忆录的名字定为《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以下简称《拷问》），我仿佛还是第一次看到。我觉得这是一个既惊人又醒人的书名。“良知”似乎比较生僻，但“良心”人人都知道。良知和良心是相通的，简单和通俗地说，良知就是良心。明代有个名讳王守仁、字讳王阳明（1472—1529）的思想家，他就是以良知为中心和主题创立了震惊和影响中外的心学。其体系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王阳明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的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也就是说，良知具有识别是非善恶的能力。所谓“良知的拷问”，也可以说是“良心的拷问”。《拷问》的作者孙怒涛先生和王阳明先生是乡党（他们都是浙江余姚人），他说王阳明先生的“致良知”学说对他“有很深的影响”（参见《拷问》第347页注1）。孙怒涛先生和王阳明先生一样都以良知、良心作为思想和行为的准绳。有人把良知比作罗盘、矩尺、量器，这是很有道理的。

我之所以从《拷问》书名谈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最近看到现任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先生也郑重地谈到良知。他今年7月16日在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做了《坚守良知》的演讲。他说：在人的一生中比取得成功更重要的是赢得尊重，而赢得尊重的关键，在于坚守良知。良知是为人处世的根本，是社会道德的底线。“坚守良知，是学校对你们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对你们的热切期盼。”（参见2013年7月17日《京华时报》报道）陈校长讲得何等好啊！怎样坚守良知？20世纪60年代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孙怒涛先生做了很好的回答。他今年出版的《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由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月出版）就是他坚守良知的真诚和忠实的记录。要了解良知，他这本书是一部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并且二者结合得很好的教材，即“知行合一”的教材。为此，我热烈地向清华的同志和朋友，——同时，也向全国的广大读者推荐孙怒涛先生的《拷问》这本书。

不为尊者讳，不为自己隐（上）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秉笔直书，是中国的修史传统。所谓“秉笔直书”，就写回忆录，特别是文革回忆录来讲，其内涵最重要的我看有两点：一曰不为尊者讳，一曰不为自己隐。这两点，我认为孙怒涛先生的《拷问》做到了，或者说，基本做到了。这是《拷问》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或特色。《拷问》这个特点或特色，我没读全书，只读到其中的一些章节就感觉到了。我本不认识孙怒涛先生，他虽然是清华大学拥有7000多人的“四一四派”的第二把手，但我没有和他接触过，也不知道他，——其原因大概也因为当时在我脑海里只有蒯大富及其“团派”（井冈山兵团）了，这对当时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本人时任江青的机要秘书）来说，恐怕是普遍现象。但在今年的四五月份，我接触到《拷问》一书的一些章节，我对《拷问》及其作者立马产生了好感，很想读到《拷问》全书，对孙怒涛先生非常敬佩。我忘记从哪里得到他的邮箱，就在5月24日给他发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孙怒涛先生：看到你的邮箱，冒昧地给你写信。你大作《良知的拷问》没有读到。看了《华夏文摘·增刊》选载的两篇，深（感）你的回忆感人、动人，关

键是真实，说真心话，把自己摆进去，既不为尊者讳，也不为自己隐。马克思说：讲真话，“是人人应尽的义务”——这条原则你做到了，做得好！可敬可佩！28日陶老（按：陶世龙——笔者）召集一个聚会，听说你到，能见到你，很高兴！

“既不为尊者讳，也不为自己隐”，这是我读到《拷问》的一些章节的评价，现在可以说，这也是我对《拷问》全书的评价。

就在28日的那个聚会上，孙怒涛先生签名赠送了他的《拷问》，其后我就开始认真地阅读他这本难得又十分想读的书。6月1日又收到了他的回信。全文如下：

阎长贵老师：您好！

首先我要向您表示歉意的是，我在北京待了10天，前天刚回杭。在京期间没有上网。这两天一直在紧急处理邮箱中的近200封邮件。您24日的邮件我刚看到。未能及时回复，敬请见谅。

在28日的聚会上，能见到您和陶（世龙）、姚（监复）、杜（？）等多位老师，我深感荣幸。聆听您的宏论，深受启发，深感受益。我的拙作虽然写得不怎么样，但是正如您所希望的，我尽力把真实的历史留给文革研究的专家学者，留给后人后世。我对本派和本人的评判也尽量做得更严格些。我非常想听到您对此书的批评意见。

“我对本派和本人的评判也尽量做得更严格些”，我很欣赏和称赞他这个态度。鲁迅先生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进而解剖自己，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西藏版第365页）我认为，孙怒涛先生接近或基本达到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的境界——若说得留有余地一点，也可以说，孙怒涛先生很自觉地以鲁迅先生所说这种境界要求自己。我说他的回忆录“不为自己隐”，也正是指他这种态度和精神。

所谓《拷问》的特点或特色是比较出来的。《拷问》这本书还有一个和其他人的回忆录不同的地方，就是孙怒涛先生在回忆录正文之前，还收录了十几个人

（都是和他一样经历过清华文革整个过程的同学、校友）缘他的回忆录而写的文章（其篇幅几乎和他的回忆录相当）。这一方面扩展和增加了他这本书的内容，有互相印证和补充作用，其中还有不少关于他这本书的评论，也对人很有启发。一个人的回忆录在熟人当中能不能经得起检验和评论，我认为这是衡量其回忆录好坏和成功与否的一个有效和有利的标尺。孙怒涛先生说他的书其目的之一就是“写给熟悉我的朋友看的”，我认为，写回忆录的人懂得和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关于对《拷问》的评论，我首先举孙怒涛先生的校友陆小宝先生的文章为例来谈。陆小宝先生说：

在我看到的众多文革亲历者的文章中，其对文革的态度真可谓五花八门。有谴责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或抱怨自己得到不公正待遇的，这种态度居多，也还算正常吧。有些人是掩饰，掩饰自己在文革中做过的错事和坏事。他们的文章中，从来只说别人怎么整他，却避而不谈他怎么去整别人。有的人呢，是自赞自夸。他们念念不忘自己当过什么头头，有什么惊人行动，或者得到过最高领袖的什么什么话的评价。还有些人呢，是自诩正确，总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对方一派是错的。当然，也看到有人在忏悔的，但这是极少数。

孙怒涛同上面所说的几种人的态度都不一样。

我们看到，在追述事实的同时，书中有大量篇幅的分析和议论。而在这些分析和议论中，且不说没有掩饰，没有自夸，没有自诩正确，就是忏悔，也只占很小的部分。他花了大量功夫，用来检讨自己在文革中所作所为。他把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放在道德良知的案板上，非常认真而且严格地尽心解剖、分析、审查，并且重新作出评价。他审视自己的行为，真是做到了一丝不苟，毫不留情。比如，一事当头，他当时是怎么想的，有过什么个人名誉利害方面的考虑，导致什么决策错误和后果，通通和盘道出。对自己这样做，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但是，相对来说，这还不算最难的。那么，什么是最难的呢？那就是：不顾情面，不怕得罪人，真正做到秉笔直书。……

他这本书的价值，不是指他的史料多么丰富，多么炫人耳目，也不算指他的分析多么精当，认识多么正确，而是指他在书中展示出来的人格和良心。（参见）《拷问》第217页）

我们再看看孙耘先生对《拷问》的评论。孙耘先生说：

《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题目开宗明义，顿时让我眼前一亮。近年许多文革当事人都在写回忆录，但这样立题的不多，在外面清华还是头一位。他娓娓地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心路，在诸多问题上探查自己的动机和效果，真诚地“认真道歉”。同时谈及对文革新的认识和思考，从而开启了清华人反思文革的一条新路。我作为同辈人，深知这个过程是多么的“痛苦和艰难”，所以格外钦佩他的坦诚、勇气和执着。（参见《拷问》第119页）

我非常赞同陆小宝先生和孙耘先生对《拷问》精当和精辟的评论。我认为陆小宝先生对《拷问》的评论以及他对其他许多文革回忆录和文章的评论，都是很客观的，很公允的。

不为尊者讳，不为自己隐（下）

不为尊者讳，不为自己隐，这确实是《拷问》的特色，最大特色，我相信凡是读过《拷问》书的人，对此是会取得共识的。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孙怒涛先生自己在《拷问》中究竟是怎样做的？

毋庸讳言，“为尊者讳”，是文革研究、文革文章（包括文革回忆录）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个人所能左右的。根本问题是大局，是政治环境。应该说，民间研究已经有不少人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突破了这点。我认为，在这方面，孙怒涛先生也是一个杰出代表。我们看看他对文革总的看法。他对这个问题的精辟论述很多。我们只举他的一段话。他说：

我认为，文革是在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基础的左倾错误路线指引下，错误的判断政治形势，采用错误的方针政策发动的一场错误的大革命；文革发动者的目的和动机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发动、领导了文革，他对文革错误负有最主要的责任；文革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民众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文革最根本的

起因，是一党极权造成的。

只要尊重事实的话，我相信都会承认孙怒涛先生对文革这种看法很深刻、很到位。当然在民间已有不少人这样指出了。可以说，这一点他和很多人的看法是相同的。而讲到“不为尊者讳”，我觉得他对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北京五大领袖谈话的解读有独到的视角和独到的见地，他讲毛泽东“对工人的态度”，表现了他极大的政治理论勇气，非常值得人们敬佩和思考。他说：

在长达五个半小时的召见谈话中，毛泽东没有说一句对死难工人表示悲痛和哀悼的话，没有说一句对731个受伤的工人、解放军战士表示安慰和问候的话，也没有对下属交代一句要他们高度负责地妥然做好善后工作的话。没有！统统没有！

当我听到他对蒯大富的全力支持，看到他对蒯大富落难时的流泪，觉察到他对蒯大富的一腔柔情的同时，我也痛感到了他对工人的薄情、寡情和无情，他的冷血和铁石心肠！要知道，这些工人都是受他之命而受伤、而流血、而丧命的！……

当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里谈笑风生、指点江山的时候，那五个死难工人的躯体还没有完全冰冷，他们的亡灵正游走在黄泉路上。五个破碎的家庭正在呼天抢地地哭喊着亲人的名字。那几百名伤员正在忍受着伤痛的煎熬，有些正在手术台上与死神搏斗。要是他们知道了他们心中的红太阳在召见的时候对蒯大富与对工人这样冰火两重天的态度，他们会觉得死得其所吗？会觉得伤得值得吗？

孙怒涛在列出死亡的五名工人的名字、单位和死因后，万分愤慨地说：

为什么召见时毛泽东对蒯大富、对414、对工人的态度迥然不同？答案其实很简单，也很明白：那就是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蒯大富是他疼爱的亲孙子；414是招他嫌的野孩子；而工人，只不过是充当他‘炮灰’的家丁而已。（参见《拷问》第635页）

孙怒涛先生不为毛泽东讳，也不为刘少奇讳，他严厉批判刘少奇“把那么多青年学生打成反革命”的错误。他说：

当刘少奇的治国方略被当做修正主义批判，他的地盘（如彭真把持的北京市）被攻占，他就毫不犹豫地派出工作组，把那么多青年学生打成反革命，把烧向他的妖火引向基层。（参见《拷问》第696页）

关于“不为自己隐”，这是许多回忆文革的书和文章，往往最欠缺的。在这方面，孙怒涛先生做出了令人学习的榜样。我们看看他的主张。——申明一点，我本想用叙述的语言，但我想不出比他说得更好的话，还是让我们引述他的几段话，听听他自己怎么说的吧。他坦诚地承认自己“狂热地参加了文革”，并“成为一派头头”，积极地进行派性斗争等等。他说：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文革中两派争论激辩的那些所谓对立的政治观点，其实大前提都是错误的，不值得再提的。最值得记忆的是闪烁着人性光辉的那一刻，最痛彻心腑的是丧尽天良的那一瞬。在你整我、我整你的文革中，几乎每个人都犯过或大或小的过错，但是并不见得每个人都会犯罪。犯罪的是极少数人。罪与错的最后分野不只是在法理上，更是在人性上，在良知上：你有没有为了表示“革命的义愤”而拿着皮鞭毒打老师、同学和干部？你有没有为了自保而诬陷他人？你有没有挺着尖尖的斜口长矛刺向对手的要害？你有没有举着带有瞄准器的步枪射出罪恶的子弹？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是突破了道德的最底线，丧失了做人的起码良知。即使你逃过了恢恢天网苟延残喘着，你一辈子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而永不安宁！

良知完全泯灭的，毕竟是极少数。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得不承认，在文革这样的大环境中，或多或少，良知都蒙尘了。

我的良知也有蒙尘的时候。

在文革期间，我说过的错话、做过的错事、犯过的错误不少。其中有一些错误，于我来说确实是无法避免的。譬如，批判刘少奇、批斗王光美、批判走资派，等等，当时的觉悟就这么一点，认识不到这是错的。还有出于派性利益那种上纲

上线、攻击谩骂、说谎隐瞒等等，当然都是错误，也是有悖于良知的。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是为了入党，为了今后前途的私利，明知不应该做，最后还是做了深感羞愧的错事。那一刻，我的良知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尘。

做过错事以后，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我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不断地在拷问自己的良知，清算过往的错误，不断地在反省追悔。虽然我做得很初步，认识得也很肤浅，但是我是真诚的。我知道现在说什么做什么都已于事无补，我只是想在我离世之前拂尘涤污，质本洁来还洁去。告知后人们，良心账是一定要加倍偿还的，有时候是一辈子都还不完的。（参见《拷问》第702—703页）

我们举几个具体例子。

——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贴了同班同学的大字报，羞愧难当。孙怒涛先生说：我与班里的几个同学在一起议论，应该写点什么样的揭发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议论过后，他们叫我执笔起草。我欣然受命。现在已经记不清这篇大字报写了点什么内容了。但是其中有一个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阶级路线方面的表现，我在大字报上举了一个这样一个例子：说我班上有一位出身高级职员的海漂亮小姐来清华上学的时候，穿着布拉吉，拉着手风琴，抱着洋娃娃，一派小资产阶级的情调。这里指的是我班一位女同学。虽然没点名，但是我班上海来的女同学就她一人。我把这事描写得绘声绘色。现在想来，这篇大字报当时对这位女同学肯定造成了很重的思想压力和很大的精神伤害。为这件事，我心里一直感觉愧疚。在毕业以后的几次同学聚会上，只要我一看到她，就会想起这件让我脸红的事情。（参见《拷问》第381—382页）

——成立414总部造成兵团分裂，是自己应负责任的最大错误。孙怒涛先生说，我一直认为我一生中做出的这个最重大的政治决断是基本正确的，认为“井冈山兵团”分裂的主要责任在团派。在我撰写这本回忆录的这些日子里，我一直在反复地重新审视我自己：在这件大事上，我做得对不对？应该怎么做才对？我应负多大的责任？要否定一件自认为在个人历史上最重大最无私最勇敢也基本正确的政治决断，是很痛苦的，也是很艰难的。痛苦在于要承认错误，要自我否定一直引以为自豪的这段历史。而这一错误，我是要负第一位责任的。因为我作为主外的“414串联会”主要负责人；因为我提议并说服“414串联会”勤务组

实施了最激进的分裂方案。看过初稿的许多老四朋友都不同意我这个观点。这虽然是我个人的认识，但是必定会影响或伤害很多老四朋友的感情。我在此先道一声歉意！（参见《拷问》第685—691页）

前面我们说到陆小宝先生称赞孙怒涛先生“……不顾情面，不怕得罪人，真正做到秉笔直书”，并认为这是“最难的”。他所举的例子就有孙怒涛先生主动承担“分裂”责任这一条。他说：“他（指孙怒涛）反思、追悔四一四的分裂行为，这样，肯定会引起一些本来一直相信他、拥护他的四一四基本群众的反对，可能从此失去民望。他明知后果，还是凭借良心说出自己的观点。这需要很大的道德勇气。……”（参见《拷问》第217页）

——为了入党亏了心。孙怒涛先生说，在1973年，江青等人发动了“反击右倾回潮”运动。我所在的教研组把史老师作为代表人物进行批判。史老师对我这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新教师的帮助和关照一直是很热心的。我与他搞一个课题，对他的认真负责和业务能力都非常佩服。要是我没有功利私心的话，在这样的运动中，虽然我不敢公开站出来为史老师辩护，起码我可以做到不说话、少说话、或者只说一些不痛不痒应付场面的话。但是，我明明知道教研组批判史老师是不对的，我为了在运动中好好表现自己，为了能够入党，我在教研组的会议上也跟着领导的调子积极发言，对他的“错误”进行批判。是听党的号召，还是听从真实的内心？在为了入党这一动机下，我最后选择的是听党的号召。这一次，我的表现让党组织比较满意。我通过了组织对我的考验。1974年10月6日，我终于入了党，成了一名新党员。虽然我如愿入了党，我心里一直觉得有愧。后来，文革被否定了，诸如“反击右倾回潮”这样的运动，也理所当然地被否定了。我的内心更多了一份羞愧和内疚感。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史老师，心里愧得慌。这是一件亏了心的事，羞愧的事。每当我回忆往事，总是内疚自责，终生于心难安！（参见《拷问》第660—663页）

实例很多，无法尽举。孙怒涛先生就是这样拿在文革中所经历一件件一桩桩的事情拷问自己。也正因为这样，他的回忆录赢得人们的信任，赢得人们的欢迎，因而不仅使人们增加知识，也使人们受到教育。

细按《拷问》的“卷首语”，孙怒涛先生在其中写道，——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庄严的承诺。他说：

首先，这是为我自己写的。回忆往事反思文革，是闲来随意想想还是落笔写成文字，认真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为自己在清华二十年间尤其是文革初期的人生做了一次系统的回顾。写作的过程，是我对自己良知的又一次拷问，也是对自己灵魂的再一次拯救。

其次，是写给熟悉我的朋友们的。他们知道我当年的言行，但是不一定了解我的内心。这本书，就是我对他们一个认真的交代。

最后，如果公开出版，是写给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人们看的。我留下了那个年代的青年学生和红卫兵头头既非清纯可爱亦非妖魔可憎的一个实例、一个标本。我的书，对于后人后世研究文革，探究文革参与者的内心世界，可能是一块碎片、一粒微尘。（参见《拷问》第345页）

又说：

写回忆文章，最难的是真实。如果失实，这样的回忆录比废纸更误人。文革中，我说过不少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有的事情想起来还挺恶心。早已知道错了，常扪心自问，暗自追悔一下，也就过去了。真要写出来，白纸黑字，朋友尽知，头上曾经的光环和虚名因此而自毁。我写作的过程中，内心一直有这样的犹豫和矛盾。

还有，有些内心的真实想法，要是写出来，会不会因言伤友？会不会以言获罪？这也是我深有顾虑的。

要么不写，要写，就写真实的我，写我的真实：我所经历事件的真实，以及我所经历的心路历程的真实。或许，这个在我笔下平常、平凡、平庸的我就是真实的本色的我。（参见《拷问》第346页）

孙怒涛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服膺王阳明先生的心学，王阳明先生心学所主张的“致良知”、“知行合一”，他是诚心诚意和认认真真地做到了。历史上有一种人被称作“言语的巨人，行为的矮子”。孙怒涛先生不是这种人，他是说到做到、言行一致的人。若问应该如何写回忆录？那就让我们认真看看并

努力实践孙怒涛先生在《拷问》“卷首语”中所做的承诺吧！

孙怒涛先生由近及远，对拷问良知的拷问做的两条深刻睿智的结论，也很值得我们人人深思。他说：

拷问良知，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做的功课。拷问的目的，是成为一个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合格公民。

拷问良知，更是执政党必须认真做的功课。拷问的目的，是成为一个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合格政党。（参见《拷问》第703页）

把自己摆进去是写作文革回忆录的重要要求

《拷问》，即孙怒涛先生的文革回忆录，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是写文革回忆录一定要把自己摆进去，必须把自己摆进去。“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全民积极参加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错了——完全错了，每一个参加文革的人，谁能白玉无瑕？孙怒涛先生说：“我认为，每个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良知蒙尘的时候。所以，不论以什么形式什么方法，认真地扪心自问想一想，反思一下，拷问一下，可能是应该的，必要的，也是有益的。”（参见《拷问》第703页）我诚心诚意地认为孙先生说得完全正确。我认为，其一，这不是说，在文革中犯错误，人人性质相同，个个大小和程度相等。“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个结论一点不错。但仅仅毛泽东一个人就能发动起“文化大革命”吗？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还需要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基础。——当然，这社会基础也是毛泽东及其同志运用毛泽东思想（换个说法：“毛泽东晚年错误”，也可以）长期造成的。用一句实质性的话说，这社会基础就是体制和制度问题（这点，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并后经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有所说明）。其二，这不是人人都要追求责任的问题，这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经历过文革的人，谁不应该想想：经历过文革这么一场大的政治运动你究竟学到了什么？换句话说，用今天的思想，或人们的常识，思考一下，在文革中你哪件事情做对了？哪件事情做错了？这都是为什么？应该汲取什么经验教

训？无疑，这都是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应该想一想，和需要想一想的。黑瞎子掰棒子式的生活方式对成长不利。“难得糊涂”一语，多年来十分流行，作为人生哲学也恐不足取，还是让我们把经历过和做过的事情弄个明白吧，——我看这也是我们写文革回忆录的目的。

为什么写回忆录——写文革的回忆录要把自己摆进去？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个人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那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很多人都知道。若掩饰和掩盖，许能瞒过和蒙过一些人，但瞒不过和蒙不过所有的人。文革是人人都参加的运动，“你拿着手电筒光照别人不照自己”是不应该的，也是不行的。对这点我有切身体会。

去年六七月，我在《炎黄春秋》上相继发表两篇关于陶铸的文章。第一篇文章《陶铸是谁打倒的》，第二篇文章《我参与了打倒陶铸》。待第二篇文章发表后，我很快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魏英敏打来的。他是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同年级同学，当时我是一个班的团支部书记，他是系团总支书记，我们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一接通电话，他开口就说：“长贵啊，我要表扬你——看到你第二篇关于陶铸的文章讲了你在打倒陶铸中的错误，我要表扬你；看到你第一篇文章的时候，我很不满意，认为你光讲别人，然而你自己呢？在第二篇文章你又讲了自己，这就对了……”魏英敏，我这个老同学向来以心直口快著称，人称“魏大炮”（大胆敢言、无畏无惧）。顺便说一下，他还有一个外号叫“魏基本”。在文革中毛泽东说：“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也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说：“我是贫农出身，入党早，历次政治运动表现好，怎么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认为，我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谦虚点说，‘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人们送他一个外号：“魏基本”。魏英敏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这个电话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也是一个很有益的启示。这启示就是：写文革回忆录一定要把自己摆进去。应该说，我自1998年以来，即退休以后，从事文革的回忆和研究，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但我读到孙怒涛先生的《拷问》，觉得和他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这方面，我一定认真向孙怒涛先生学习。

读《拷问》，思《拷问》，我最深刻和最大的体会，就是孙怒涛的校友，也

是“四一四”派的一位名叫但桑的先生所说的几句话：“心地善良是做人的根本。社会要以人为本，人要以善为本。”（参见唐金鹤《倒下的英才》利华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303页）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倡导“信史立国”、“信史立民”。在致力于信史方面，我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和研究者，愿与广大史学界同仁以及文革历史的回忆者和研究者共勉！

最后，我还是以孙怒涛先生《拷问》扉页上的几句话作为本文的结语：

文革是一个大劫难，陷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
文革是一场大地震，撼动了国本也震醒了中国心
文革是一次大暴露，凸显一党极权体制严重弊端
文革是一座大炼狱，拷问着每个人的道德和良知

附记：我对《良知的拷问》说了一些赞扬的话，并不是认为它已经十全十美，它也有缺点和不足，但我觉得瑕不掩瑜。关于它（以及所收录的孙怒涛十几位校友的文章）的缺点和不足，我专门写了一个材料给孙怒涛先生，现附在这里，供读者参考。

附：《良知的拷问》中一些技术性问题

页28，最后一段，“八月八日，以批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宗旨的……”。确切地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1966年10月《红旗》13期社论正式提出来的。

页53，倒数第2段，“早在1965年，在韶山滴水洞，老人家用了38天的时间……”。毛泽东回韶山住滴水洞不是1965年，是1966年，不是住了38天，是“十几天”（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1页）。

页67，第2段，“七月底，江青在一处讲话中首次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

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揪军内一小撮’的歪风。”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搞成因果关系不准确，恐怕也不能这样说。

页 73，倒数第 2 段，倒数第 3 行，“文学宓、李康都较早**往生**”。“往生”？

页 85，第 1 段，“1962 年……鼓吹‘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句口号是毛泽东青年时期提出的。

页 110，倒数第 3 行，“跳进黄河也**讲**不清”。“讲”应为“洗”。

页 125，倒数第 2 段，第 6 行，“**既**使对‘反动学生’还坚持……”。“既”应为“即”。

页 130，第 3 段第 3 行“……革命的**权力**”。“力”应为“利”。

页 181，第 2 段，第 3—4 行，“不能把文革中的一切错误都推在他的头上，例如说他发动了文革中的‘**全面内战**’。”这句话不能说不对，但“全面内战”确实是毛泽东号召的。关锋生前说：1966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在他的生日家宴上，举杯祝酒时说：“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我听到后都怔住了，觉得不好理解，在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时把‘全面内战’改成了‘全面阶级斗争’。”关锋这个记忆可能是对的。当时在场的戚本禹 1967 年 1 月 10 日在总政话剧团接见部分革命造反者时说：“现在形势一句话，概括地讲，全民的全国的阶级斗争，各个战线，各个地区，用火药味的话来说，就是全面展开内战。”（参见 1967 年 3 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首长讲话》，第 1 本，第 84 页）我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关锋记忆的一个佐证。显然，如果毛主席没这样说过，戚本禹是不能也不敢这样讲的。徐景贤在《十年一梦》又提供了一个佐证。他说，1966 年 12 月 27 日姚文元给他打电话说：“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徐景贤问姚文元：“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可不可以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范围内传达？”姚文元说：“不要开大会，你们先在小范围里吹吹风吧！”接着，徐景贤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骨干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提醒与会者思考：“毛主席说的全国全面内战开始了，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我们应该怎么做？”（《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4 年版第 7—8 页）看来，毛泽东在生日家宴上确实说了“全国全

面内战”。

页 202，倒数第 2 段第 2 行“不禁……而且”，“禁”应为“仅”。

页 214，第 1 段第 9 行“……互相倾扎”，“扎”应为“轧”。

页 232，倒数第 1 段第 2—3 行，“文革前夜，戚本禹发表《评李秀成自述》，借考证李秀成降敌叛变，影射瞿秋白被俘变节。”此论不确。不能说戚本禹 1963 年写李秀成是“影射”瞿秋白。文革研究专家余汝信在《和戚本禹面对面》中谈到这个问题：余问：评李秀成自述，是否上头旨意？与当年重提《逸经》（《多余的话》）的瞿秋白狱中自白有无关联？戚答：诚然，文章发表后，得毛击掌赞赏，并在一张刊有此文报纸空白处批曰：“白纸黑字，铁案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这张报纸后来不知所终），但该文写作完全是个人行为，绝非奉命文章，与对瞿秋白的再评价，亦无丝毫关系。

页 233，倒数第 1 段第 10—12 行，“太史公批评别人‘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有瞎编之嫌。但《史记》中，尽显一己好恶之处，却也比比皆是。”不知这样评价《史记》和司马迁妥当不妥当？

页 272，第 6 段第 1 行，“蒯大富就象……”。“象”现在应为“像”。

页 278，第 2 段“有暇可击”。“暇”应为“瑕”。（又见 403 页）

页 298，第 1 段第 4 行，“犹为荒唐处……”。“犹”应为“尤”。

页 298，倒数第 2 行，“只有厚黑如毛，才会把富农改为中农。”这个论断的根据？毛仿佛没有回避过他的家庭成分是富农。

页 299，倒数第 1 段第 1 行，“欲盖弥脏”。“脏”应为“彰”。

页 300，第 3 段第 5—6 行，“我心理难过极了”。“理”应为“里”。

页 309，倒数第 3 段第 3—5 行，“地院的头头朱成昭……他和囚禁中的彭元帅几番长谈下来，得出结论：彭德怀是正确的，毛主席错了。”朱成昭没和彭德怀长谈过，经过长谈认为彭德怀是正确的，这个结论是他手下人做的——当然向他报告了。

页 310，第 4 行，“主持全军文革的关锋”。关锋是全军文革的副组长，还不是第一副组长，他怎么主持全军文革？

页 413，注 1 慰红卫兵。“慰”？

页 438，倒数第 3 段“循规滔距”。“滔距”应为“蹈矩”。

页 501，第 4 段，“文革前，陶铸……中宣部长。”文革前，陶铸不是中宣部长。

页 508，注 1 “林杰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林杰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页 523，倒数第 2 段“扬弃”。“扬弃”是个好词，意为“有扬有弃”，不应当“抛弃”用。

页 537，倒数第 2 段倒数第 1 行，“即使天桥的庙会，也没这样的闹猛。”“闹猛”？

页 539，第十三节第 2 段，“……《红旗》杂志 12 期社论……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样叙述不确。请参看《问史求信集》中《“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实质和来龙去脉》。

页 579，倒数第 4 段，“2 月中，戚本禹倒台。”戚本禹是 1968 年 1 月 12 日晚上被抓的。

页 602，“瞿秋白……1935 年红军长征时他被留在井冈山。”不是留在井冈山，是留在中央苏区。

页 649，倒数第 5 段，“我救灾座位上……”。“救灾”是“就在”吧。

【述 往】

我亲历的“吃人肉事件”

王 锐

1

近年来因种种原因，甚至在一些有身份地位，似又有点学识的人士那里，也公然出来否认“大饥荒”的存在。我自己，算是那场“大饥荒”百分之百的亲历者；不仅见证了全社会大饥荒存在，而且见证过其中最可怕、最残酷、最违背天理人伦的“吃人肉”。

尤让人震惊的是，这个“吃人肉”，不是发生在哀鸿遍野的农村，而是发生在城市，发生在距区政府市政府不过数百米的市中心，对社会的冲击不可谓不大。半个多世纪了，对该事件的人和事，我记忆至今甚是真切；不仅当事人的身份姓名，我记得清楚，甚至连其音容笑貌，我仍还历历在目。

这是因为，当事人既是我同班同学（初中、高中都是）的父亲，而且是同居一条小巷中，相距不过数十米的街坊近邻。我从家里去学校上课，若走老校门，必经其家。若是从学校上街，不管走新校门、老校门，也必经过其家门口。真可以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长辈。

那个时候，自贡有两所著名的中学。一所是胡绩伟先生曾经入读过的自贡一中。另一所是谢韬先生入读过的，李慎之先生曾做过教员的自贡二中（今蜀光中学）。自贡一中前身是“培德女子中学”，由加拿大传教士于民国初年创建。中共接管后更名为自贡一中，“大跃进”时又更名为不伦不类的“釜溪中学”。后恢复一中原名至今。自贡二中则是抗战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在原自贡私立蜀光初级中学基础上，投资新建的，据说仿天津著名南开中学的格局，气派很大。中共于1950年代接管后，改为自贡二中，后来又一度恢复“蜀光中学”的校名，至今仍是。

当年自贡一中有新旧两道校门。整个校园建在市区山坡顶上，进老校门要爬一二十级很陡的石阶。石阶上完，才是校门。校门是一座古色古香的中式门楼，如今早已折毁，连遗址亦荡然无存。新校门则是沿小巷往西一直走，到当年的自

贡报社及市广播站合用的一处西式别墅台阶前，拐个90度大弯，向北数十米即是。新校门可勉强通小车，不用爬石梯。老校门虽说坡陡石梯多，但无论上学还是上街都更近，许多学生都爱走老校门。

我那同学的家，就正对一中的老校门。也不是完全正对，而是小巷往西偏大约一两半。说是家，其实相当寒酸，不过是在小巷围墙上搭建起来的几间简陋瓦房。因为不敢多占小巷通道，屋子进深估计最多两米样子，说不定还要少。任何人从小巷经过，屋内破旧相及里面动静一览无余。这几间旧屋，大概民国时就有了，又在小巷中，中共建政后，也没因其有碍学府观瞻而拆迁。其实，就当时而言，整个城市民众，除了少数过去大户人家建政后又没被没收，及数量也不多的政权新贵，居所大都是那番模样。

我是1956年考入自贡一中的，是初59级6班。当年编班，可能是校方为方便管班，一律按家庭住址编，那年一中初中8个班，我在6班。我们6班，全部是一中新旧校门附近那几条巷子的同学，颇占地利之优。在家里，连上课下课的钟声亦可闻。这个当事人的大儿子，家在一中老校门，就此成了我的同学。

2

这个同学姓罗，叫罗某祥，属班上的大龄同学。大我两三岁，且个高体壮，力气大，打架和劳动都是强者，在班上就多少有点让人瞩目。罗同学还有个特征，即青春期早，脸上就常有青春痘，男同学讥为“骚仔仔”，又戏称为脸上布满碉堡，也就此获得个雅号“罗堡”。以后，习惯长成自然，只要是非正式场合，几乎声喊声应。

初中毕业，正是1959年，大跃进热火朝天。四川境内新办了许多中专，同学多数分流，成绩最差的几个大龄同学，去了市干校。但升入高中的是少数。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罗同学没报中专，也没去干校，而是选择读了高中，按理他成绩不够好，三年高中后升大学的可能性不大。

那年自贡一中只招收了两个高中班，我和罗同学在2班，称为62级2班。1959年下半年，“大跃进”已成强弩之末，但受那种思潮影响，学生“支农”、“支工”劳动甚多，经常下乡下厂，劳动整周，甚至整月离校干活。罗同学力气大的优势，充分得以发挥，为此还连当了数届“劳动委员”，成了班上为数不多的班

干部之一。平时不免就偶有得意之色流露，与同学说话带点领导口气。问题是，他考试成绩总不见长进，也不敢太得意，怕别人敲打他。

我们那三年高中，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下半年，正是全国性大饥荒的高峰年代。虽然是在城市，虽然是在条件相对较好的中学，但大饥荒的阴影，也是无处不在。

先说家里，那三年，我家就先后死了四位老人：我祖母、三祖母、我外婆，以及一个未成家数十年来一直寄居我家的孤老“陈么爷”。

过去我家是个较大的家庭，1950年代中期卖房分家后，无后的三祖母及生活无着的“陈么爷”，也随瞎眼祖母一起，迁到一中附近小巷的新家，由我父母供养。其后不久，外婆老来无依，也迁来同住。我家就有了四位老人。当然，也不能说他们都是大饥荒时饿死的，因为他们毕竟都是城市户口，每月有一份微薄的口粮。但可以肯定的是，都是营养不良而死。当时，城市居民每月供粮22斤，后来为国家“自愿”节约一斤，仅21斤，平均每日7两。而且真正到口的没有那么多。

原因是大跃进搞“城市人民公社”，居委会都办起了“公共食堂”，所有供应都不能直接到户到人。这样，能让居民真正吃到肚子里的又打了折扣。本来上面规定60岁以上老人，可以自行买那份口粮，自行在家做饭，不必去“公共食堂”受罪。但权力在居委会主任那里，居委会主任不批条子，你拿着购粮证去粮店也买不到口粮。

我亲眼目睹过，我年过六旬的外婆，想按政府规定，自己买口粮在家里做饭的恳求不被允许，反被那个女居委主任骂了一顿，回家只能暗自垂泪的情景。当然，那供应的口粮定量也更换不成同等数额的粮票（也正是当年粮票比钞票更值钱珍贵的原因）。这是毛泽东时代控制社会最极端的做法，哪怕城市居民，你也无法离开居住地，当然更不能反对什么人，否则死路一条。那时不是正式官员的居委会主任，乃至组代表（即居民小组长），也似乎掌握着居民的生死存亡大权。我家里的四位老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相继离世的。他们起码算那场“大饥荒”的间接受害者。

再说学校。承蒙当局开恩，供粮政策对学生多有照顾，尤其为数不多的高中生。中学生每月定量最初好像是32斤，后来也是“自愿”向国家节约1斤，成

了31斤。无论如何，每天能有1斤的供应。在学校伙食团，除每年有一段供应红苕的日子，每天吃蒸红苕外，一般是米饭（其中杂有少数打碎的包谷）。例行是三、四、三的吃法，即是说，早饭3两，午饭4两，晚饭3两。

菜更是差，午晚是品种单一，缺少油水的大锅菜，而早餐则经常是每人半小勺带霉味的包谷酱，当做下饭菜。印象中，高中那三年，除了上课应付考试，人人的主要心思，大都放在吃上。不管男生女生，胃口都奇好，都能吃。

典型的例子，就是那时曾经下厂支工劳动，中午那顿午饭厂里无法解决。路远，学生也不能回校来吃，学校食堂就想出个花样，当天的午饭，就随早饭一起蒸了，也随早饭发给每个学生。让学生将这份午饭带着，中午就在工地自吃冷饭。有同学嫌带着麻烦，又经受不住热饭的诱惑，干脆将两份饭一起吃在肚子里了事。我亲眼所见，这样做的，不仅有班上的男生，也有女生。现在的人肯定很难想象，十六七岁的小女生，样子文文静静，却不声不响地就着一小勺霉味很重的包谷酱，把两份饭（一共7两米饭）通通吃进肚子。那两份生蒸米饭合起来，体积很不小。然后再去干上整整一天的劳动活儿。

这种办法我也试过一次，早餐一次吃两个饭，当然很愉悦，很享受。可是到了中午，尤其整个下午，饿着肚子劳动的滋味确实不好受。饿得头昏眼花，差点晕倒。有了这次教训，我再不敢劳动日早餐把午餐的饭一并吃下。还有一次，也是下厂支工，工地却在野外的一个什么井口。周围无房屋棚子一类，只好把午饭用帕子包好，放在田坎边上。中午休息吃饭时，打开一看，竟是密密麻麻爬满了蚂蚁，黑压压好大一片。虽是头皮发麻，也有点恶心，但心痛那饭，舍不得扔掉（扔了就要饿一下午的肚子，还要劳动），只好一点一点的清除饭里的蚂蚁。又是那种罐蒸饭，米粒之间粘在一起的，蚂蚁钻进去了，很难清除得干净。没法，那天中午，我也就仿佛闭着眼睛一样，硬着头皮把那几两冷饭吃了，干干净净，一点不剩。其间，也肯定不知生吞了多少在饭里没被清除的蚂蚁。没经历过那种灾荒时代的人，肯定无法理解当年人们对所谓“食物”的那种近乎变态的心理感受。

同学之间，也常有为“吃”，闹得不愉快，甚至脸红脖子粗，甚至发生吵架、打架的事。总之，“吃”成了当时人们所关心的全部主题。

“吃人肉”事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有了这种社会大背景，发生吃

人肉这种事，后代人也会对来龙去脉多几分深入了解。

我那同学的父亲，是个大胖子，50来岁。以前（指民国时代）是干什么的，不得而知。但不会是资本家或是在社会上吃得开那一类。否则，那同学就会有“家庭成份”不好的包袱，也不可能当班委班干部。平日观察，其家境也不像。可能是个小商人吧，我们读中学时，好像也没什么正式职业。但其人长得个心宽体胖的样子。没事时，常见他在家门口一把椅子上喝茶闲坐，看巷子里走过的人笑咪咪的。街坊邻居称他为“罗大爷”。我们这些中学生偶尔经过时，也这样称呼他，他也笑咪咪点点头，大家对他的印象，总的还不错。谁也不会想到，那样恐怖，听起来也让人胆战心惊的“吃人肉”的事，会发生在他身上。

3

事发那天，我们也正是在下厂“支工”劳动。中午吃饭休息时，有班上一男同学飞奔而来，口里叫道：“走，快去看！罗堡的老汉（当地方言，意为父亲）煮娃儿吃，被公安局逮了！”

一众同学大吃一惊，即随之飞奔而去。地点在釜溪河南岸富台山麓，张家陀码头之上的半山坡上。那里，当年曾是一片荒坡。河对岸不远处，即是区政府机关大楼的所在。

我们赶到时，“有人煮娃儿吃”的消息已经传开。通向山坡的一条小路，以及沿河码头一带，都有赶来看热闹，打探消息的人。具体事发地，是在小道半坡上，一处石灰窑旁边。那山坡处，早两年开始，可能经有关部门批准，有人就在那里取石烧石灰。那处小石灰窑，河对岸可见。我们赶到时，涉案当事人及作案物证——一个大铁鼎锅，已被警方带走。现场除了一个还冒着白烟的石灰窑外，荒坡上已是一无所有。石灰窑也没人。有的只是我等一样赶来看热闹的市民大众。

从据称目击者的叙述中，具体事发经过大致如下。

被我们称为“罗大爷”的同学父亲罗某章，其时，正在给这个小石灰窑守工地。因此他一日三餐也在这里。他在旁边生火架起锅灶做点饭烧点水，也很正常。山坡上平时荒无一人，小道上过往的人很少，这就为他敢于在这里用鼎锅“煮娃儿”提供了方便。不过，其竟敢光天化日之下干此勾当，还是多少出人意外。

他那天的最终案发，也在于他的一个疏忽，一次过于自信的大意。他那天本

来一直守在煮东西的鼎锅旁，严密守候着，不让人看知其鼎锅中的秘密。时值中午，煮着的东西也煮熟了，可食了。但他须去坡下一处地方打饭。想了一阵，看荒坡里四下无人，小路上也无人，就起了一丝侥幸，想自己速去速返，不会发生意外。于是就短暂离开了一直守护着的鼎锅。

也活该那天有事。他刚离开没几分钟，恰好一个做工者经过石灰窑那里（据说是到坡上小解方便），见灶上大鼎锅里热气腾腾状，炖煮着什么“美味”东西。那年头，人们对吃本能地有种兴趣，自己吃不到，看一眼也是不错。出于好奇，他多跨了几步，来到锅灶旁，趁暂无主人，悄悄打开锅盖偷看一眼。

这一看，就看出了大事，鼎锅内，滚滚沸水里，正炖煮着的，正是一个完整的婴儿！

“不得了！有人煮娃儿吃！”那人吓得丢下锅盖，就往坡上飞跑，一路大喊。

“有人煮娃儿吃”的消息，就此传开。公安及相关部门得到消息赶来，连人带物，当场拿获并带走。我等同学赶到时，只见到那座石灰窑，以及煮过东西那座简单火灶还在。

虽说是灾荒年代，“吃人肉”也算得一大奇事，天字第一号新闻。况且是在人口密集的市中心，消息是无法掩盖的，这件事，可谓妇孺皆知。渐渐，人们所关心的是两点。其一，这娃儿是哪里来的？是不是被他杀死的？其二，这个罗某章“罗大爷”会不会被“敲沙罐”（当地方言，意指判死刑，其时执行死刑，是用枪打脑袋）？

后来说法渐明朗化，“罗大爷”煮吃的是死婴。其埋下当晚，被他侦知且连夜掘出。第二天白天欲煮食而事发。从后来的最终处理结果看，也印证了这种说法。涉案者罗某章后来并未被称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判死刑，而是判了数目不详的徒刑，入狱劳改。没多久，又被以“保外就医”释放回家。

后来，社会上也有多少为“罗大爷”说点话的。说他那么个大胖子，胃口好，食量大，一天7两米咋够吃？饿慌了，找不到别样可吃的，只好打“死娃儿”的主意。不然，他也只好饿出“浮肿病”等死。

这次事件后，罗同学一度在班上有些抬不起头，比较沉默，比较低调起来。毕竟，父亲出了如此大案，而且是如此伤天害理为人不齿的缺德事。他也很害怕班上的男同学借此事经常攻击他，开他的恶意玩笑。不过，好像大家都很有趣。

印象中，似乎从没人去触及过他的这处“伤痛”，没人开他的恶意玩笑，拿他老爸的“人肉事件”说事。包括班上最调皮最爱以恶作剧为乐的男同学。似乎隐约还听一些同学议论，都是社会造成的，是时代的错。

过了大概一年，或是两年（有的又说不到一年），听人说“罗大爷又给放回来了”。其时，经济形势已在开始好转，是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之故（后来才知道是刘少奇等大力纠正毛泽东一系列胡整行为的结果）。据说是因其年纪大了，又病重，怕死于劳改地，由家人办了“保外就医”。

后来过了很久，才听有同学私下说，罗大爷之所以没关多久就出狱归家，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大女婿私下出力运作的结果。罗的大女婿，即罗同学的哥哥，其时在市内某个政法部门任职。经他出面，走了点关系，促成了此番“保外就医”。

不过，罗大爷入狱前后，两相比较，身体状况变化的确很大。那时，全社会都苦，监狱、劳改场地更苦，老年人体弱者，生存下来，颇不易。其出狱不久，我见过他一次，也是在巷子里他家门口。其时，我已从一中高中毕业，高考因故落第，失学在家待业。那天，我从巷子里经过，远远看见罗大爷坐在门口晒太阳。其坐姿甚至与过去一模一样，但人却是瘦了一大圈。原来一个大胖子，如今身躯骨架还在，却是神态气度与从前大不一样。脸盘仍是宽大，但眼窝深凹，脸颊嘴巴也塌下去了，显得颧骨突出，鼻骨、下巴也突出，模样有些怪诞。特别是其眼神呆滞，脸上似乎有一股令人胆怯心寒的阴霾之气。样子有些吓人。

我已是走到眼前了，退无可退。只好硬着头皮，低头装做看不见，赶紧快走几步，从他身边匆匆走过。过去那个心宽体胖，笑咪咪在巷口椅子上喝茶闲坐，有时高兴还会招呼他一句的“罗大爷”再也不复存在。如今现实中的，是老朽衰弱，周身上下了无生气，脸上透出一种阴冷死亡气息的僵尸般人物。

4

罗大爷虽没多久就出狱，免除了长期牢狱之苦，但其最终结局也很凄惨。出狱归家没多久，他便离家独居。

张家沱码头之上，当年有个很大的菜市场，称“源渊井综合市场”，是自贡市区最大的蔬菜及副食品集散地。罗大爷离家后，就在菜市场之外的路道一侧，一个财神庙或土地庙的残墙处，背靠其石壁，用捡来的竹片、旧木板、塑料布、

油毛毡之类杂物，搭起一个棚子。其终日食宿于此，以此为“家”。有人说，他是被家里人撵出来的。有人又说，是他自愿搬出来独居，不想连累家人。到底真相如何，不得而知。也没听罗同学讲起过。

至于其生活来源，自是成问题。一个风烛老人，长居一个不能遮风躲雨的棚子栖身至终，处境是很差很糟。说其晚景凄凉悲惨，一点不为过。

文革爆发没几年，偶去那市场，没再见到那烂棚子，自然也没见到人。一问，说是“已经死了”。

这件“吃人肉事件”，因偶然因素，被外人发现而中止。“东西”已煮好而未吃成，可称为“未遂”。但多年后听同班同学私下议论说，其实罗大爷为“吃人肉”这事，是蓄谋已久的，做过很多准备。

一中老校门往东，走市街方向，大约30米，当年竖有一块“义学”的大石碑，差不多有小孩子那么高。出处何在，不知。石碑下二十来步石梯，有个小院子。其中有个姓赵的住户，是个铁匠。因是街邻，与罗熟识且关系较好。据说事发前，罗曾让赵铁匠为他打造一个很长的铁爪子。赵问：“打那么长的铁爪做啥？”罗答：“用来抓肉。”赵铁匠当时就发愣，饥荒年代，哪有肉可抓？且那么长，能抓多大块肉？事发后，才知罗大爷是专为捞抓人肉而特别打造这长铁爪。

再后来，有与罗同学很要好的同学透露，罗同学曾经给他们讲过一件事。说是他老汉，这次事发被公安抓走之前，曾经有三两次，用大茶缸或小罐子盛不名“炖肉”回家，叫家人共吃。而且，其父只说是肉，不说是什肉。案发，才怀疑这些“炖肉”，可能来路同样。若此说为真，说明其此次案发前，已有类似行为经历。

当然，此说亦存疑。原因是罗同学可能故意夸大或编造事实，以在同学面前显示自己经历见闻“不凡”。那时同学间常有这种“自夸”、“自编故事”的现象。

此说是否为实，即这次罗某章“罗大爷”所为“未遂”之前，是否有“已遂”事例，只有当年部门机构的相关案件档案可证。

2013年10月初

【述往】

一生育桃李 终身求真知

——纪念《记忆》的良师益友刘秀莹老师

潘祛病



刘秀莹老师遗像

刘秀莹老师是终生从事中学教育的老教员。五十年代初，她从师大女附中高三毕业考进清华数学系，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而母校又缺教师，她没等大学毕业就退学回校当了老师。

此后，刘老师一直在师大女附中工作，从教数学，到教政治；从做班主任，到做教务主任。文革前夕，她被调到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局。

1968年，刘老师在家里与弟弟和几位朋友议论时局：“一句就顶一句，怎么顶得了一万句？说毛是顶峰恐怕不太合适，以前说是朱德的扁担，¹现在怎么又改成林彪的了……”。结果被朋友揭发。刘老师成了现行反革命，被扣上恶毒攻击毛、林；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四项帽子；抄家、批斗、劳改……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过重重磨难的刘老师回到教育口，先后在北京两所著名的重点中学——八中和四中担任校长，直至退休。

2012年4月的一个午后，作为《记忆》的编辑，我去拜访刘老师，事情的起因是《记忆》刊载过一个小资料，其中提到刘秀莹老师在1967年向卞仲耘的家属提供了卞校长受害的情况。刘老师阅后，打电话告诉我们，这一资料有误。此行就是向刘老师了解个中情况的。

这是我第一次见刘老师。她因严重的肾病，蜗居在家多年。老人的眼圈是病

¹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一部分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的队伍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国民党对井冈山地区实行经济封锁。中共地方党组织动员群众为山上送粮。朱德经常带领战士下山挑粮。中共建政后，朱德挑粮的故事被收入小学课本，他用过的扁担成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实物。

痛折磨下的青黑色，在说话的时候，不断地挠着手背，皮肤都被抓破了。她告诉我：“咱们这么坐着，我看不清你，眼睛也几乎坏掉了，肌酐值接近透析的指标，皮肤瘙痒得厉害。夏天还好些，你来了，我还有气力和你说话；到了冬天，我就更不好了，几乎起不了床……”

关于那则资料，刘老师说得很清楚：“1967年，云谲波诡，我自身难保，根本不可能与受害人的家属联系，更不可能向他们透露什么有用的信息。况且当时我已经不在师大女附中工作了，社会上那么乱，学校里的事，我是几年后才听到的。”刘老师希望《记忆》能发一个更正：“我从来没有去过宋淮云家，更不可能在1967年的时候，在她家开什么会。文革都过去46年了，小资料有记错了(的情况)也都是有可能的事”。¹

我抚着老人的手背，想告辞。可刘老师挽留我：“你们办《记忆》是有功德的事，我愿意把我知道的情况告诉你们，通过《记忆》留给历史，留给下一代。”接着，老人回顾了文革中北京中学发生的暴力，介绍了文革结束后，北京市教育局清查三种人的经过：当时市委成立了“清理三种人”小组，组员分赴北京各区县调查文革时期发生的暴力事件，尤其是文革之初红卫兵私设公堂，打人抄家，以及在学校内外打死人的情况。正在大伙干得带劲儿的时候，中央下了文件，红卫兵的事不准再查下去，并且要求大家上交调查笔记，由上面统一销毁。我们后来得知，这是因为当年的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给胡耀邦写了信，为红卫兵辩护，说他们当年保护了老干部，是与中央文革对着干的，并受到了中央文革的迫害，因此不能算做“三种人”。中央因此下了文件，来了一风吹，使所有的调查工作戛然而止，给历史留下了一笔糊涂账。这对于文革研究是一大损失。

刘老师还告诉我，“尽管那些调查记录全销毁了，不过，北京市教委还是将建国后的教育情况编了26册《北京市普教资料选编1949—1985》，²我们都叫它大白本，其中有一本是谈中小学文革时期情况的。尽管已经比调查时的材料删减了很多，但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现在这些资料不知道北京市教育局还有没有了……”

虽然衰老久病，但是刘老师记忆力惊人，说起女附中的学生在校的成绩和表

¹ 详见《记忆》第84期“来信选登”栏目《刘秀莹的三点声明》。

² 北京市教育局内部参考资料，不是正式出版物。

现，如数家珍。更令人惊异的是，她的思维敏锐，条理清晰，谈起文革，谈起文革前的教育，往往一针见血：“为什么文革期间会出现那么多打老师、打死老师的事情？这是偶然的？为什么这些悲剧都从高干子弟聚集的中学开始，为什么挑头的都是干部子弟？十七年的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做老师的都给学生教了些什么？”

临告别时，老人缓缓地挪回卧室，取来一本她参与主编的《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书中夹着一张事先写好的很多老教师联系方式的字条，希望我能看看这本书，再找字条上的老人们做更详细的访谈：“我都跟他们联系过了，到现在为止，北京中学文革中的这些事情并没有完全说清楚。你们要抓紧时间，这些老教师都八九十岁，说走就走了。他们都亲历过各自学校文革最残酷的时期，我希望他们能把这些事讲出来，越多越好，越详细越好。”春去秋来，笔者按照刘老师的嘱托，寻访当年的老教师。历史虽已远去，但许多的记忆还沉浸在莫名的恐惧中，待再和刘秀莹老师交流沟通，却传来老人病危入院的消息。

《记忆》主编启之先生去医院看望刘老师时，她还念念不忘，希望《记忆》能将关于北京中学文革和十七年教育的历史整理刊载出来，希望更多的当事人说出历史真相。

2013年11月27日，刘老师带着她对教育的思考，对文革的反思和对《记忆》的期待驾鹤西去。刘老师的社会责任感，催我上进；她对晚学的推心置腹，令我铭感。刘秀莹老师，安息吧！您的未竟之志，总会有人完成！

【编读往来】

1. 周元龄的建议与纠错

《记忆》编辑部：

我最近从网上下载了《记忆》第1期到第66期，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以前在网上看到的一些高质量的文章都是源于《记忆》。

作为一个新加入的读者，衷心希望《记忆》越办越好！以下意见，可能有点“吹毛求疵”，供参考。

一、《记忆》第102期有两句病句：

1. 第30页注一中：“……笔者2006年3月8日对1966年访谈施慧珍时，……”似乎应是“……笔者2006年3月8日对施慧珍访谈时，……”

2. 第36页第一行：“叶永烈写过一部《“四人帮兴亡”》（全集，以下简称《兴亡》）。”中多了“全集，”。

二、《记忆》第102期第37页倒数第12行：“……在他心中埋下了对厂党委不满的种子。”《兴亡》第413页……

我对照手边的《“四人帮兴亡”》（《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上述内容是在第636页，并且在“中”和“埋”中间是有个逗号的。建议以后《记忆》杂志中凡是提及的著作，能指明出版社和出版年月，以便于读者对照比较。

三、前几个月在网上看到了德发的一篇介绍陈阿大的文章（<http://blog.sina.com.cn/s/blog-4cde83c801016d5y.html>），文中说陈阿大在2004年已经去世。如果属实，建议补充到《记忆》第103期第33页注释2中。

四、《记忆》第103期第18页，照片下面说明文字中漏了吴法宪的名字。

五、《记忆》第103期余汝信纠错一文中，多次出现一位“武司令”，可能指的就是《风雨苍黄三十年》的作者武传斌。但是为什么要称其为“武司令”，余应该在文中有个交代。另外，在武的文章中提到赵紫阳对武的一些话（《记忆》第102期第57页），多年前在网上一些文章中早就看到过。值得质疑的是凭赵和武的关系，赵会对武说这些吗？

周元龄

2. 何蜀谈任彦芳文章之误

《记忆》编辑部：

104期任彦芳的文章不错，但有个重要日期有问题：唐漠是7月5、6日两天连续斗争后，6日晚写下遗书，于7日凌晨自杀的。那么发现他自杀后的对其进行批判声讨，就应该是7月7日，但所引日记却又是“6日上午”。恐怕是作者笔误。

何蜀

3. 吴盛杰谈文革历史研究

《记忆》编辑部：

今天读了《记忆》104期的最后一封读者来信，让我颇有感触。联想到之前启之老师写的纪念王年一老师的文章，我也想谈一谈我自己的一些感受。

我是一名中共党史方向的研究生，本科开始就关注文革和文革研究，算上我真正进入研究学习的时间，至今已有五年。虽然在这个领域我还只是个小学生，但是五年对我这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还是不短的。五年以来，我扪心自问，学力的增长确实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一方面当然是我的努力不够，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共党史特别是文革研究上我的困惑太多。

首当其冲的便是，走在这条路上太孤独。我的父母不知道我搞这些东西干什么；我的同学虽对此有兴趣，但都只停留在猎奇和愤青的状态。就连我兴致勃勃的要报考的博士生导师，在我跟他交谈时，他说了一句：“现在要搞文革搞不起来”。我知道，这后面有数不清的原因让他也转了方向。同样的命运会不会落到我的身上？作为一个可以说未经世事的年轻人，我是不是低估了作为强力的党的意志呢？读完启之老师的文章之后我也常想，有一天如面临这样的局面，我会怎么样？讽刺的是，每年我们系里都会有同学进入这个国家机关，我们也偶然谈到以后会不会在另外一个场合见面等等。当然，我也可以高喊，我的一切都是纯粹的学术研究。但是就像高华先生的书一样，尽管我亲耳听到来自中央党校的某领导对此书有很高的评价，但是并不妨碍高层有人不喜欢并禁止书的出版。这也许就是中国的现实，历史研究永远脱离不开政治。

拿文革研究来讲，我感触最深的，还是王力在他的回忆录中的一段话：现在

没有一个人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只是说毛主席晚年错了，周围有一帮坏人，几亿人就都发疯了。这叫什么教训？这样就会继续重复过去的东西，不能从沉痛的教训中真正得到益处。彻底否定是很容易的，那就不用总结了。这是血的教训，根本没有总结……当然，说没有一个人在认真总结，是过分夸大了。从文革开始后，就不断有各种各样的人对文革进行研究反思。但是，这无疑是对主流文革叙述的一次经典的评价。在“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指导下，所有官方的历史论述只在历史决议的框架下行事，至多加进一些可以证明这些观点的新材料。

网络的出现，无疑在某种程度上稍微改变了这样的情况。拿我自己来说，现在可以从淘宝上找到一些代购商购买港台的书籍（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都买不到了），第二是各种电子书和电子档案的出现给我一些资料。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接触到了像《记忆》一样的刊物。他们的研究文章，可以给我不断提供精神食粮。读他们的回忆、来信，可以使我产生共鸣，让我有继续研究下去的动力，所以我十分感谢《记忆》杂志！

金大陆先生说，现在的文革研究，应在开掘导致文革灾难的多元性要素和多方面性关系方面下功夫，使整体化的文革运动在历史学学术的框架中全面地沉淀，经过历史学家的提炼和总结，再全面地呈现，从而为整个民族记取这灾难与教训打下一根不可动摇的历史定论的支柱。其立意甚高，令人鼓舞。以金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已经开辟了文革研究的新路径，从下层做起，做扎实的实证研究。这样，既可以避免意识形态的干扰，又可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为文革研究做贡献。希望我也能有成果回馈给《记忆》。

此致

敬礼！

吴盛杰

4. 庄晶瑞称赞顾土之文

顾土的《非毛化》一文写得真好。现在批判“非毛化”，并非为了弘扬继承毛泽东和他的思想，而是为了当权者自身的合法性，为了巩固他们已有的权力。所以，凡是不利于巩固权力的，即便是毛的也不能提。只能按照他们的需要，来

宣扬和继承毛的那一套。现在的毛泽东，早已不是毛本人，而是“任由统治者打扮的小姑娘”。

5. 读者谈杨继绳的文章

这期杨继绳的文章非常好，我仿佛还没看到过这样深刻论述文革的文章（徐海亮在来信中也说这篇文章好）。

——阎长贵

《记忆》104期所刊杨继绳《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一文，高屋建瓴，纵览远近，说理透彻，语言明快，是一篇反省历史、解放思想的力作。该文从道路、理论、制度等不同层面，深刻剖析了文革大动乱的起因和运作规则，勇破禁忌，澄清迷雾，实事求是，探究真相。从某种意义上说，等于宣告了官方营销的文革史观的全面破产。

重新认识文革，深入反思文革，总结惨痛经验，增强公民意识，使中国的民主化建设更加理性平稳——这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民的心声。1981年公布的那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早已陈旧不堪、破绽百出。不少有识之士都曾呼吁，希望党能够与时俱进，站在新的高度重新评价文革历史，并从根源上杜绝灾难重演之路。然而，任你千般呼唤，他是纹丝不动。其原因就在于，那套已经陈旧的文革史观，本质上是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正如杨继绳尖锐指出的：“官方文革史观既保全了毛泽东思想，又保全了中国共产党，也就保全了整个官僚集团，保全了官僚集团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和他们的全部利益。”垄断对既往历史的解释权，就是为了垄断对现实利益的支配权。

文革不仅是全民族共同经历的灾难，也是全民族共同拥有的遗产。对于这样一场内涵复杂、影响深远的运动，绝不可能仅仅由一党一派来做结论。自文革结束以来，无论是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还是思想领域，经常是民众走在前面，是人民在推动着党往前走。党看不见的事实，人民逐渐看清；党迈不开的脚步，人民正在迈出。我们欣喜地看到，民间反思文革的浪花，正由涓涓细流渐成澎湃之势。杨继绳这篇登高望远、大气磅礴的论说文，据说是正在撰写中的《文化大革命通

史》的序言。此文的公开传播，预示着冲决藩篱、荡涤人心的思想解放大潮终究是不可阻挡的。

——晓星

杨继绳的文章，很有深度。

——张晓良

在我所看到的反思历史的学术文章中，杨继绳的《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革的思考》一文是最好的。

——任新民

6. 吴赛丽、黄小龙谈《记忆》

每期必看，收获良多。你们辛苦了，为历史留下真实。向民族的史官致敬！

——吴赛丽

严冬时刻，向你们崇高的坚持与执着致敬。

——黄小龙

7. 赵晖对胡庄子之文的纠正补充

《记忆》编辑部：

《记忆》第101期刊发的胡庄子一文，谈对朱永嘉书的感想。应该说，朱的书在揣摩毛晚年心态方面确有一得。但如果说朱永嘉有些观点难免有美化毛之嫌，却不一定准确。在此仅举一例：“年轻的王洪文，是林彪事件后毛泽东选的接班人。毛泽东对王很器重，但这并不足以让党内军内一些元老服气。朱永嘉说：许世友明明知道毛泽东在培养王洪文作为他的接班人，还公然阻挠和反对王洪文进入中央领导层，在利害的关键问题上，他并不给毛泽东以脸面。”（54页）这段文字中关于许世友反对王洪文进入中央领导层的记载，应源于颇具权威的《毛泽东传》，有相当的可信度。但正如毛传重要编撰者李捷所言：“（《毛传》不可能把所有的材料写进去，因为，第一，受篇幅的限制；第二受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好写。不好写的原因主要还不是因为说出来以后有损于毛泽

东，而是说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这还是有一些禁区的。”（李捷：《对毛泽东新中国探索的再思考》，《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关于许世友在十大反对王洪文作接班人的具体过程，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郭玉峰的回忆就很有趣：“8月30日召开一中全会，选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全会前，周恩来同志召集会议，讨论党的副主席候选人，当提到王洪文为候选人时，许世友同志反对，他提议江青作候选人，会上为此争吵起来。开始我在京西宾馆二楼会议室有事不在场，田维新同志派人把我找回来听会，这时会上还在争吵。后经周恩来同志做工作，留王洪文作候选人，争吵才算结束。”（闫晶明著：《我丈夫郭玉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郭玉峰的回忆没有否定毛传的记载，但他提供的补充情况，却可以让我们对许世友的作为有更清晰的认识。而如果许世友在十大上的表现真如郭玉峰所言，那么所谓王乃至“四人帮”遭到党内军内元老反对的说法就存在很大的不确定。须对此展开进一步的分析探讨，而不是简单作为信史采纳。

顺颂近祺！

赵晖

【年终小结】

2013年的《记忆》

启之

今年是《记忆》创刊的第五年。年终将至，对今年的工作略做小结。

1. 一年来，编辑部共收到来稿 162 篇，刊载了 105 篇。出刊 14 期（包括两期增刊），收到读者来信七十余封，选登了五十余封。

2. 王立嘉先生加盟《记忆》，增加了编校力量，使校对错误大大减少。

3. 《记忆》与数家纸媒合作，向其推荐优秀稿件，使胡鹏池、方子奋、潘祛病、公孙雨、孟犁野、胡庄子等多位作者的文章在纸媒上刊载。

4. 《记忆》贯彻“面向民间、面向青年、面向同仁”的编辑方针。推荐原清华大学毕业生、散文作家胡鹏池先生来京，参加首都师大文学院五月召开的“创伤记忆与文学表征：文学如何书写历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5. 与出版社合作，推出了《记忆》第三、四本“精选”——《故事不是历史：文革的纪实与书写》和《水木风雨：从清华历史到清华精神》。前者已于今年四月出版，后者将于明年三月问世。

6. 周向红、许洋、胡小水、李红云、阎长贵、李逊、阿陀、熊景明、程真、余汝信、唐少杰、印红标、杨继绳诸位朋友，在这一年中对本刊的工作多有帮助，谨此致谢。

2013年12月31日

【2013年总目录】

2013年总目录（92—105期）

（93期、96期增刊目录附后）

【专稿】

1. 胡鹏池 清华园的一只蝴蝶——也谈《良知的拷问》（92期）
2. 李 逊 上海“红八月”：十七年阶级斗争的延续（94期）
3. 邓 鹏 1967年4月后文革派系冲突的发展（95期）
4. 胡庄子 “联动”九章（97期）
5. 孙 耘 直面良知：我的文革心路历程
——读《良知的拷问》之后的一次谈话（一）（98期）
6. 孙 耘 直面良知：我的文革心路历程
——读《良知的拷问》之后的一次谈话（二）（99期）
7. 孙 耘 直面良知 我的文革心路历程
——读《良知的拷问》之后的一次谈话（三）（100期）
8. 唐金鹤 浅谈孙耘的《我的文革心路历程》（99期）
9. 周家琮 文革春秋——文革与历史关系的几点思考（99期）
10. 〔美〕邓 鹏 被放逐的朝圣者
——文革前老知青的精神炼狱（100期）
11. 邓 鹏 文革初期的大民主
——一个概念的名与实（100期）
12. 顾 土 理论与文革（101期）
13. 李红云 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
——从一份原始记录说起（102期）
14. 天 穹 研究林立衡材料的几个切入点（103期）
15. 杨继绳 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104期）
16. 余敏玲 同中有异的两岸党国体制（105期）

【毛泽东研究】

1. 唐少杰 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105期）
2. 余汝信 “五七指示”：毛的理想社会模式及其破产（105期）

【林彪研究】

1. 于鹏飞 杜鹃 “但悲不见九州同”——王维国遗稿读解（二）（92期）
2. 赵晖 林彪与高饶事件——侧面看高饶事件之二（92期）
3. 于鹏飞 杜鹃 “但悲不见九州同”——王维国遗稿读解（三）（94期）
4. 蒋健 1971，林彪是否对毛泽东不辞而别？（101期）

【上海文革】

1. 李逊 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上海造反派的最初榜样（95期）
2. 李逊 上海“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的造反生涯（98期）
3. 丁德发 我与潘国平最后相处的日子——追思潘国平（98期）
4. 高达 金大陆 关于和解与真相的对话（98期）
（附）徐蕴 在父亲徐景贤遗体告别仪式上的发言
——女儿永远怀念您（98期）
5. 李逊 上海工厂里的造反派
——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积极分子们（一）（102期）
6. 李逊 上海工厂里的造反派
——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积极分子们（二）（103期）
7. 李逊 上海工厂里的造反派
——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积极分子们（三）（104期）
8. 李逊 上海文革史稿·导言：革命名分的诱惑（105期）

【山西文革】

- 余汝信 曾鸣 文革中山西的专区、省辖市夺权（98期）

【中学文革】

胡庄子 首都兵团·中学红代会·四三派/四四派（100期）

【博士论文】

1. 向前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
——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七）（92期）
2. 向前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
——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八）（94期）
3. 向前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
——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九）（95期）

【评论】

1. 胡鹏池 1918年的北大图书馆发生了什么？（97期）
2. 曾昭奋 我们这一届的反右派运动
——华南工学院与清华大学的比较（101期）
3. 廖康 我糊涂——从外交到内政（101期）
4. 胡庄子 毛泽东晚年对生前身后事的忧虑与处置
——读《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的笔记和感想（101期）
5. 黄金海 《“四人帮”兴亡》一书的得失
——与叶永烈商榷（一）（102期）
6. 黄金海 《“四人帮”兴亡》一书的得失
——与叶永烈商榷（二）（103期）
7. 黄金海 《“四人帮”兴亡》一书的得失
——与叶永烈商榷（三）（104期）
8. 顾土 警惕另一种“非毛化”（104期）
9. 阎长贵 不为尊者讳，不为自己隐
——读《良知的拷问》兼谈文革回忆录的写作（105期）

【述往】

1. 郑公盾口述 咪咪编撰 我与李英儒、金敬迈同志的交往（92期）

2. 胡鹏池 在三个伟人之死的日子（95期）
3. 老潘 逃出生天记——我的偷渡经历（97期）
4. 公孙雨 接生记——插队轶事之一（98期）
5. 华建南 “学习班”记事（98期）
6. 公孙雨 拾马记——插队轶事之二（99期）
7. 漂木 小提琴手（100期）
8. 曾昭奋 与逃港狂潮无关的广东人逃港（100期）
9. 姚蜀平 儿女祭——纪念我的母亲（101期）
10. 武传斌 风雨苍黄三十年——我和赵紫阳的交往（102期）
11. 廖康 红宝书（102期）
12. 公孙雨 验尸记——插队轶事之三（102期）
13. 李斌 一个狗崽子的迷惘（103期）
14. 任彦芳 唐漠之死与我的忏悔——我的文革日记与回忆（104期）
15. 王锐 我亲历的“吃人肉事件”（105期）
16. 潘祛病 一生育桃李，终身求真知
——纪念《记忆》的良师益友刘秀莹老师（105期）

【争鸣】

- 余汝信 曾鸣 也谈中央文革小组的结束时间（104期）

【随笔】

1. 曾昭奋 泪洒《墓碑》——清华大学校庆随笔（98期）
2. 胡庄子 革命语境下的粪便（103期）

【序与跋】

1. 金光耀 一个工人造反派的文革记录
——从叶昌明的《工作笔记》看“工总司”（97期）
2. 〔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九一三”回望》序（98期）
3. 启之 《故事不是历史——文革的纪实与书写》编者前言（99期）

4. 启之 《错乱狂飙的毛时代》序与跋（101期）
5. 启之 《揭秘中国电影 读解文革影片》序与跋（103期）

【检讨与交代】

1. 李慎之 交代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活动（1969年1月25日）（92期）
2. 李慎之 交代我在家信中暴露的问题（1969年2月10日）（94期）
3. 李慎之 交代我在对毛主席态度问题上的罪恶思想（1969年2月14日）（95期）
4. 李慎之 补充交代我在1962年的反动思想——包括我在家信中所暴露的反动思想（1969年3月20日）（97期）
5. 李慎之 交代和揭发我和郑德芳之间相互散布的反动言论（摘录）（1969年4月8日）（98期）

【简讯】

1. 本刊编辑部 任冬林先生病逝（99期）
2. 本刊编辑部 首都师大文学院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创伤记忆与文学表征：文学如何书写历史”（99期）
3. 童园 北京大学史丹福中心召开“21世纪书写毛泽东时代的历史”
学术研讨会（104期）

【书讯】

1. 潘祛病 《李慎之的检讨书》（1957—1990）全二册问世（97期）
2. 高原 《“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一书出版（97期）
3. 韦陀 《朱厚泽文存》问世（99期）
4. 向胡杨 《故事不是历史——文革的纪实与书写》出版（98期）
5. 向胡杨 《邵燕祥自书打油诗》在香港出版（99期）
6. 向胡杨 《错乱狂飙的毛时代》出版（100期）
7. 向胡杨 《揭秘中国电影 读解文革影片》一书在台出版（102期）

【故纸堆】

1. 触目惊人——从王府井百货大楼十五号几个柜台一天的售货情况看反革命经济主义的严重影响（92期）
2. 情况简报 北京市民对厕所集体化的意见（1959年4月20日）（95期）
3. 北京市政工程局文革运动中自杀人员情况（1979年12月25日）（95期）

【小资料】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1967年3月18日）
（92期）
2. 1966年南京“八三”事件的若干档案资料：（94期）
 - （1）江苏省公安厅关于文化大革命保卫工作情况专报（31）（1966年8月9日）
 - （2）关于“八三”事件专案调查情况简报之一（1978年9月14日）
 - （3）在宣布逮捕华林森、汤大民决定大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15日）
 - （4）关于南师“八三”事件的调查报告（1980年4月13日）
3. 任冬林 整理 胡祥风日记摘抄（1951—1952）
——新时代日记选编（一）（99期）
4. 任冬林 编纂 文革资料编目（99期）
5. 要准确地引用毛主席语录（101期）

【编读往来】

1. 胡泊谈顾土文（92期）
2. 邱路光谈《“西纠”九问》（92期）
3. 丁凯文、唐少杰为《记忆》勘误
4. 编辑部致歉（92期）
5. 《记忆》主编告读者（92期）
6. 陈益南谈专题（94期）

7. 顾士谈知青逃港（94期）
8. 张晓良谈知青逃港专辑（94期）
9. 阿陀更正（94期）
10. 沈迈克谈文革中工农的遭遇（94期）
11. 编辑部答复（94期）
12. 钟志生询问来信未发一事（94期）
13. 编辑部答复（94期）
14. 张晓良为94期纠错并谈读后感（95期）
15. 卫大伟谈李逊的上海文革研究（95期）
16. 桑客谈文艺创作专辑（97期）
17. 杨耀健谈《记忆》开设文学平台（97期）
18. 袁清华谈96期三位作者的作品（98期）
19. 杜钧福谈李逊的上海文革研究（98期）
20. 张晓良谈97期（98期）
21. 美国读者潘志佳赞老潘逃港一文（98期）
22. 编辑部郑重致歉：98期李逊文中的潘国平照片误植（99期）
23. 曾鸣纠错（99期）
24. 张晓良谈98期（99期）
25. 98期孙耘文章题目更正（99期）
26. 《1971，林彪是否对毛泽东不辞而别》一文补遗（102期）
27. 蒋健纠错（102期）
28. 李逊纠错（103期）
29. 陈闯创谈注释（103期）
30. 启明谈李逊文（103期）
31. 郑文生询问金祖敏情况（103期）
32. 余汝信纠武传斌之误（103期）
33. 杜钧福询问武传斌文中一段话的出处（104期）
34. 武传斌答杜钧福（阿陀整理）（104期）
35. 周元龄谈黄金海与叶永烈商榷之文（104期）

36. 碧瑶谈读《记忆》的感想（104期）
37. 周元龄的建议与纠错（105期）
38. 何蜀谈任彦芳文章之误（105期）
39. 吴盛杰谈文革历史研究（105期）
40. 庄晶瑞称赞顾土之文（105期） 5
41. 读者谈杨继绳的文章（105期）
42. 吴赛丽、黄小龙谈《记忆》（105期）

【年终小结】（105期）

93期知青逃港专辑（增刊之一）

知青逃港专辑

目 录

【特 稿】

李建中 从“督卒”到“起锚”

【往 事】

- 黄东汉 波涛暗涌求生路——“起锚”之一
出生入死偷渡客——“起锚”之二
不屈不挠逃港者——“起锚”之三
生死与共大鹏湾——“起锚”之四
永志难忘红树林——“起锚”之五
神州北望思故乡——“起锚”之六
阿威的“长征”——“起锚”之七

【个案研究】

阿 陀 知青逃港潮——广州培英中学老三届调查

【口 述】

- 陈×成口述 阿陀整理 出埃及记
何×芝口述 阿陀整理 上地
张×恕口述 阿陀整理 麻风坑

虾哥口述 阿陀整理 策划者
欧×梁口述 阿陀整理 为了生存
曾×萍口述 阿陀整理 美丽的新世界
罗×超口述 阿陀整理 在文革高潮中逃港
邬×芝口述 阿陀整理 永生难忘的一幕
陈×津口述 阿陀整理 梁成根的最后晚餐
郑×伟口述 阿陀整理 从海南岛到香港岛
朱×其等口述 阿陀整理 我们为什么逃港

【读者来信】

张晓良纠错

96 文艺创作专辑(增刊之二)

文艺创作专辑

目录

编者的话：审美地写

【小说创作】

任国庆 扛刀的故事

山乡的戏

远山

【散文创作】

胡鹏池 林彪素描

一个地主儿子的大学梦

李楞子与外祖父——一个贫农鳏汉与一个地主老头的故事

【文坛往事】

山月 父亲，人变鬼、鬼变回人的跌宕人生

【作家与作品】

姚蜀平 《悲情大地》作者简介

《悲情大地》故事梗概

《悲情大地》后记

《悲情大地》(节选)

【评论】

陶东风 一部描写文革的百科全书式小说——读姚蜀平的《悲情大地》

何启治 《似水流年》——文革浩劫的悲歌(节选)

《悲情大地》读者评论摘选登

【编读往来】

1. 《记忆》编辑部致歉
2. 小邓鹏照片及简历
3. 小邓鹏来信
4. 何志雄谈向前的博士论文

【版权声明】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并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